

鋼鐵的鍊成

蘇北出版
社 版 出
版 出

28492

100509

857.7
4122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1 2483B

鋼
鐵
的
鍊
成

蘇北出版社出版



上海圖書館藏書

~~1176328~~

鋼鐵的鍊成

編輯者 蘇北出版社

出版者 蘇北出版社

經售者 各大書店

一九四六·七月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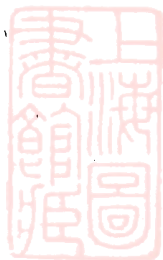


小 跋

這里搜集的幾篇文字，都是實際鬥爭中求得進步的自我宣白，內中沒有煊染，沒有誇張，都是一字一淚的寫出了自己曾經不願寫和不肯寫的文字。這些文字的所以彌足珍貴，以至編冊付梓，爲着要了解他們由昏沉到大踏步前進的痛苦過程，對於我們無疑是有益處的。

這些文字的來因，可說是經過了整風運動以後的一個具體表現。讀者應該把它當作「整頓三風」的參考資料來讀的。

編 者



目次

自傳與全面反省·····	一
存整風中鍛鍊自己·····	二五
我是怎樣從敵視共產主義轉變願為共產主義奮鬥到底的？·····	五
我向黨坦白內心鬥爭的過程·····	三
我的內心鬥爭過程·····	七



399640

自傳與全面反省

從幼年到成人的生活歷程

一九一八年我生在上海，父親在文具業有相當基礎的活動範圍，和長江各埠客商有營業上的聯系，家裏時常讌客，這些客商們在茶後酒餘還有什麼不來的，我的商人意識的養成就種因於此。

家庭經濟收入約百元以上，以當時滬地生活水平，堪稱爲小康之家。父親共生我們姐弟四人，我是老二，他是一位嚴厲的家長主義者，無聊或失意時，時常鞭撻家人，引起在幼時就產生對父親的不滿。

小學生生活變動無常，由於軍閥內戰的緣故，本來住在上海的郊外，爲了戰事不得不遷移到租界中去。高小畢業在滬西同善公學，這時家已搬到麥根路麥根里去了。

啓蒙以後的童年生活是完全沉浸在古書堆裏。在自己的幼稚心靈中，非常醉心路見不平拔劍相助的俠客，崇拜那些封建時代的旋乾轉坤的英雄。由於瀏覽稗官野史，傳奇小說的結果，童年意識充滿擎天拔地，位極人臣的生活意願。

日本法西斯繼「九一八」以後，再發動「一二八」無恥侵略。戰爭的火藥味在自己生活空間四週散佈着，「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古訓，和活生生的戰鬥場面激起了應該投筆從戎的民族意識。



一九三三年春轉入三育中學讀書，因爲「一二八」戰事的影響，家裏一部房子在閩北被燬。而且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性經濟恐慌，因受戰事的襲擊更顯得猖獗，滬地百業蕭條，父親整日愁眉不展，斤斤於家事。在不景氣的浪潮沖激中，我就由一個莘莘學子而跳到小職員的地位中去。

一九三三年秋，父親介紹我到開明書店印刷部任校對，月入三十元。開明書店是以出版中學書籍聞名的，工作環境給予我一個良好讀新文藝書的機會，我的薪水收入家裏不大過問，有了這一良好的經濟條件，廣泛地和社會接觸起來，交了很多的朋友，參加口琴社圖書館的各種社交活動。初次和社會接觸，給我的反映是充滿新奇的眩惑的。

在口琴社裏活動交識了一位出色的友人吳途。這位吳途君是一個大學生，在商業方面有獨特的修養，生活的觸角密佈滬地四週。由於他的啓示，引導，使我更進一步的深入社會。

一九三五年春，我和吳途合辦了一個半做投機生意的文具公司，爲了拉成自己的經濟勢力圈，一下子換了一百個弟兄的帖，在「騙術，交際術」的輝煌戰旗下，儲昌公司每月盈餘五六百元，養成我濃厚的商人行爲是從這時開始的。如此豐富的經濟收入，驅使我們向奢華浪漫的生活方面裏去，十足的小布爾喬亞的金黃色的夢，只能繼續四月之久，無節制之揮霍，形成債台高築，以致無處容身。吳途到天津中國銀行去依傍叔父去了，我則利用過去築成的一百個弟兄的經濟關係，在上海流浪了五個月。吃、喝、穿、用都取之弟兄身上，時間一長，就使我那些弟兄感覺討厭，甚至以後見了我就遠而避之，這時才體會到「世態炎涼」，沒有經濟基礎，那裏有什麼名堂能混出來，還是回家去罷。自開明書店的不辭而別，離家已有九個月了，家裏正爲我的行蹤四處覓訪。回家後，受了父親一番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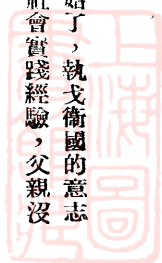
斥，重再介紹我到益新書店去擔任外埠推銷員。一年以後，神聖的民族戰爭開始了，執戈衛國的意志勃然而興，便與友人謝範李森二人毅然離滬從軍，家庭是不同意的，但我已有社會實踐經驗，父親沒有辦法再管束我了。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我和友人投入江蘇省保安九團學生大隊受訓，集訓二月，通榆線戰事起，學生大隊沿如、東、鹽、阜、漣各縣進遷撤至淮陰。九團已潰不成軍，團長楊仲華撤職查辦，學生大隊已無後台老板，識相的軍官和學員在後撤時已作鳥獸散了。此時八十九軍建制已成立，九團改編爲一七師三四九旅六九八團，學生大隊改爲步兵第三連。我當上等兵。

國民黨軍隊的士兵生活是充滿着痛苦的矛盾的，官長對士兵的壓制，打罵剝削，士兵對官長的不滿，表面服從。二年多國民黨軍隊生活也使我染上舊軍隊的習氣，現實的生活反映在自己的意識上，認爲長此以往，實非久計，於是展開活動，結果就混到司令部去當文書。這時接到家信，知道母親已歿，內心十分悲慟，況且離家已久，也想回去看省一下，但上面請假不准，我就不辭而別了。

一九三九年的秋天，重返上海，家裏因母死、父病、姐嫁，生計一無着落。戰後的孤島生活不能和「八一三」以前同日而語，而自己的經濟關係又因受戰事襲擊，早已支離破碎。父親渴望我回家來能解決生活問題，雖然我日夜忙碌，但家境日益顯得拮据，在這一階段中，因受生活的壓制，我在敵偽血腥統治下的戰後孤島，作着尖銳的慘厲鬥爭，其具體事實如下：

一九四〇年春，我接連投入幾個文具公司去當野雞推銷員，每天的收入，只夠我自己吃大餅，家裏都等待我的錢回去填肚子呢。這老行當我失掉了過去的自信心了，這時引起脫長衫的內心鬥爭，但



終於又去做街頭推銷員，可是收入僅僅足夠吃飯，至於房金，日常零星開支，父親請大夫吃藥的錢，只能從賣家具上去解決。之後決定和弟弟兩人一同到永安紗廠去做拾紗頭的小工，工資每天二元，由於我的態度傲慢，和管車間的日本人動起武來，算了罷，識相一點，連工錢都不敢拿就溜掉了，如果這時渾渾噩噩，拖到日本憲兵那裏，這一頓臭打是難挨的。以後由永安廠裏的工友介紹我到華中電訊公司去當自來水小工，爲了割地下室的地線，給工頭查出來，準備把我送日本憲兵司令部，當天晚上，我煽動一個工人，得到了他的幫助，鬆了我的綁，利用了兩只長釘，兩個鐘點艱巨工作，把用三夾板構成的牆壁，截穿一個大洞，脫險以後，心裏是非常愉快的。

第二天日本憲兵接連到我家光顧三次，家裏不能住了，上海同樣不能站腳，父親又病得很厲害，家庭負擔那能允許我高飛遠走呢？

我打埋伏在麥根路的友人家裏，這時有位和我同姓的友人，名叫守鑄的，向我提起汪精衛在上海的什麼大隊去做工作，另一位友人樂某卻要我去當和平軍的教官。我都加以拒絕，因爲家在上海已有三四十年之久，一旦給親友知道自己竟墮落到如此地步，那還會有面目去見人呢？

憲兵隊已在通緝我的消息得到後，便不敢在上海逗留，因此決定到崇明去找孩提時的總角交李清海了。

一九四〇年底只帶了一塊五毛錢單身赴崇，身上破爛得一似叫花郎，這一塊五毛錢，還是賣了弟弟的上衣，以充足旅資的，李清海這時在崇明區公署政務警察隊當班長，還有什麼旁的出路呢？我就補上了一名僞警，月入四五十元，但吃了伙食，頂多只能多餘十幾塊錢，吸幾包煙就完了，不過我每

月都寄回家用四五十元，錢的來源自然是敲來的竹槓。意識上認為儘量的搜一批錢，再脫離苦海罷，民族意識倒並不因當二黃而沖淡。

一九四一年九月父親在貧病交攻之下亡故，這時憲兵對我的家仍未放鬆注意，只寄回去五百塊錢給弟弟，由他料理喪事，心裏亦不悲慟。父親的死我是早已估計到的，反而使我感到輕鬆，因為父親一死我便沒有理由負擔家計，應該是脫掉黃衣服的時候了。恰值蘇德戰爭與南太平洋戰爭爆發，國際局勢明朗化，抗戰前途已露勝利曙光，我利用機會又攪二千多塊錢，出賣了同班的同人，是夜秘密乘小輪抵達浦東，由浦東再轉入上海，簡單料理家務後，即準備束裝出發，目的地是八十九軍。

在崇時結識當地青年極多，裏面有幾位是敵工科的工作同志，由此得悉了蘇北是新四軍的天下。二千多塊錢等我再離滬時，只有六百多塊錢，作為長途跋涉的費用是不夠的。在這種客觀條件下，使我不能不有所顧慮，因此我和崇明的敵工科同志接上了頭，由他們指示了我到本軍的路線，我就離崇赴滬，在海門池棚鎮找到了盛××同志，身邊已分文全無，當天就到三旅教導隊學習，時間是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綜觀上面所述的許多事實，我從踏入社會起即貫串着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意識，但在帝國主義和國內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三重掠奪下，生活水平以拋物線的形式急降急落到破產者的地位。在這一階段生活歷程中，我從一個學生轉變為開明書店的小職員，一個出色的投機商人，流浪者，抗戰後就成了一個兵士，孤島生活又迫我去做一個工人，直至於墮入歧途。

塑鑄成自私自利個人主義的人生觀，其養成的根源及發展過程在於：

第一、依據小資產階級生活的經濟條件，衣食無愁，自幼就養成養尊處優的生活習慣，享樂主義的根據。由於童年浸沉在封建思想傳奇和故事的影響，在意識上刻劃上出人頭地的英雄主義的思想，養成唯我獨尊自高自大自命不凡的習性。

第二、由於家庭背景是務商爲業，因此產生唯利是從，拮据究兩，以金錢地位來衡量人，對待人，由於自己在鑛昌公司的投機生意上，稍有成就，在一百個弟兄中我是老大，由此產生了好名沾利，虛榮心，濃重的地位觀念。

第三、由於參加友軍所受教育の影響，熏染上當面服從，抗上，裝老油條的舊軍隊習氣，在崇明重返上海這一段生活過程中，嚴重地沾染上墮落性的生活習慣，「今朝有酒今朝醉」，放蕩不羈的自散漫習性基於此。

總之，這一生生活過程中的社會活動，是浸透在向上爬的個人主義梯階上的，現實的黑暗社會給我的反映，真能寫成一篇充滿動人而又使自己悚然的詩篇。關於這一生生活歷程的政治背景，我應該作如下的敘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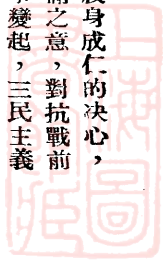
一九三四年，我十七歲，爲了構成自己的經濟勢力圈，一下子掉帖了一百個弟兄，成立一個俱樂部，活動的目的完全是在受患難「相互援助」。老大就是吳途。鑛昌公司辦得轟轟烈烈的時候，我們這個弟兄集團同樣也處得如漆如膠，因爲以圖利爲目的，鑛昌公司倒閉後俱樂部也隨之上崩瓦解，沒有錢還談什麼弟兄。當時俱樂部的中心人物就是我和吳途。

一九三七年抗戰開始，毅然從軍的動機完全是民族意識的作用，動機純真，有殺身成仁的決心，但在參加該軍二年的時間中，一無發展，更由於該軍生活的腐敗高壓，也產生了不滿之意，對抗戰前途是有信心的，對三民主義和蔣介石也抱着極大的希望。崇敬領袖的觀念是從西安事變起，三民主義的了解則是在小學時代。我之所以因母喪斷然返滬，主要還是在該軍無出路的緣故。學生大隊的許多同學在八十九軍任下級軍官的極多，但自返滬後，音訊斷絕，目前已毫無關係了。

一九四〇年在崇明的人事關係，因為二千五百塊錢是全班的利益，給我獨吞逃走後，這些黑色動物恨我入骨，由於我急要脫離崇明，手段不得不辣一點，也就顧不得了。與盛××（敵工科工作人員）認識是在崇明×鎮的偽青年隊，能夠到本軍來還是他的工作威力。（關於這段歷史，三旅敵工科有許多人是了解的）。

二十多年的生活歷史，是從建設一個經濟勢力圈，但同時又破壞一個經濟勢力圈中的變化過程中演變着的。開明書店工作是不告而退，鑄昌公司倒閉後債台高築，在文具界中已無立足餘地，從第八十九軍回來同樣是「自己准自己的假的」。孤島生活的一段偽吃飯而展開的尖銳鬥爭，竟至於麻煩日本憲兵光顧了好幾次，日寇不退出上海，我回上海是不可能的。在崇明這一段身污的生活歷史，由於自己手段太辣，雖然無證無據拿不了我怎樣，但總是不能再明張旗鼓的重返崇明。我苦心孤詣地構築自己的人與人的關係，造成自己有利的生活空間，但在人剝削人的社會客觀條件下，我又無意識的自動毀壞自己的活動環境，當然在崇明這一段的關係是有意識的破壞的。

、 回溯自己的二十幾年的生活歷史，不禁使我瞿然心驚，剝削人，被人剝削的流轉關係，吃人被人



吃的基礎，驅使自己泯滅天真。爲着聲色利祿不惜採取欺詐、掠奪的手段，以致於跌落到痛苦的深淵中去，而還不自覺地渾渾噩噩，如果還不回頭是岸，我再也沒有能力拒絕歷史給我的裁判了。

入伍後的思想變化過程

一九四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我和三旅敵工科的盛××及邱×兩同志，一同入三旅教導隊學習。處於自由散漫的生活領域中的我一旦流轉到每星期二次緊急集合的集訓生活中來，精神和肉體都起着不正常的反應，首先是不習慣艱苦的生活作風，其次由於本軍的組織嚴密，不能再像過去一樣地來構成自己的生活活動圈，引起精神上極大的苦悶，對黨的認識是敵視的，在三旅教導隊的全學習過程中，從沒有和支部書記談過一次話。在生活上亦因不習慣而表示疲勞現象，發洩精神苦悶的辦法，是專找上海同志，互相拉攏感情，無形中拉成智識份子的小團體，但自擔任俱樂部主任以後，情緒就變了，工作熱情而負責，連午睡都放棄掉，充分表示積極努力，一直保持到畢業時擔任學習組長爲止，情緒從未低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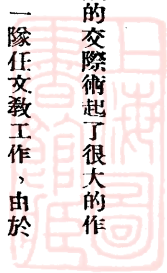
一九四二年九月，旅教導隊畢業，組織上分配我到七團三連任文教工作。由於工作經驗沒有，對本軍的認識又不足，一躍而要我負責一個連的文教工作，因而在工作中表現了空疏膚淺不着邊際。但自高自大自命不凡的虛榮心倒不因之而減色，爲了到鐘點號兵不吹號的細微小事和連長衛××鬧起糾紛，官司一直打到宣教股。

十月任三旅教導隊文教。由於是一個幹部的訓練機關，身爲所謂「幹部的幹部」，內心不免「沾

沾自喜」。在工作中表現得唯命是從，一切生活工作都委屈求全，商人意識的交際術起了很大的作用，隊部及教員室各同事，給他們的印象都頗為良好。

十二月教導隊實行人事改組，原有幹部只剩下孫××、江××和我，仍在一隊任文教工作，由於自己工作時間較長，下層工作略有基礎，工作中就更表現出目中無人唯我獨尊，和新任政指王×鬧無原則的糾紛，在學員中廣播不利王×工作的言論，不願接受王政指在工作中的領導，嘲笑他的俱樂部工作計劃，斥為「教條」。同時由於工作關係不好，而產生工作情緒不穩，結果終於和鄭×同志對調工作。

一九四三年一月，旅教導隊南下赴江南與抗大合併，此時在二隊工作。政指郭×是我的老政治教員，在工作關係中對我態度傲慢和隨便一點，更由於行動時爲了背俱樂部用具，以爲指導員的背包還要人挑，文教背包自己背還不算，還要加上公家的東西，真是太不平等了。郭政指的個性比較強，嘴裏經常流露出「媽特皮」之類的不遜口吻，由此引起各方面的不良反映。於是我乘機向楊××石×二教員提出反對郭×的提議，意識上對郭×不滿，同樣影響工作情緒，孫教導員曾爲我和郭政指的關係，與我談一次，但並無效果，我始終認爲當文教是一無出息，不及行政幹部甚至還不及軍事教員威風。正因爲工作關係處不好，生活又艱苦，當我們經過丹陽延陵時，我準備開小差的。但由於請假不准，當晚又離延陵幾十里宿營，才沒有溜掉。通過延陵鎮時，我親自經過舅父所開的××麵館的，可是可望而不可接，徒呼奈何罷了。在這一工作階段中因爲工作時間較久，認識的東西亦多了一些，在這樣的客觀條件下舊意識又開始死灰復燃，表現得最嚴重的是因人因事的工作方式，以及虛榮心和



絕對的平均觀念。工作關係的不好，更影響了自己工作情緒，以至動搖，因為生活的興趣無從寄託，又不肯學習，認識上一無進步，享樂觀念風頭意識更蓬蓬勃勃地一發不可收拾。

二月教導隊與抗大合併，郭×調走了，教二隊改編八隊，校部又調來馬政指，田軍教及張××同志人八隊工作。新的人事關係與新的工作背景，重新刺激起工作情緒，尤以文化預課階段中，工作緊張，繁忙。但由此而產生教員室和隊部的不協調，自高自大的個人英雄主義又大大的發展，嚴重地受着張××的言論和生活的影響，在行爲上表現自由散漫歡喜誇誇其談，以及悲觀失望的情調，對張××的遭遇盲目加以同情，大有兔死狐悲之感。對上級採取敷衍藐視的態度，不願意接受上級的指示和決議。對下級則採取譁眾取寵的工作態度，無原則立場的採取調和拉攏的教學關係，認爲工作做好是自己的能力表現，這是一種高級的榮譽和精神享受。在認識和言論上始終不願承認是爲黨工作，不合現實的超階級心理，是小資產階級的自高自大的自尊心又一表現。因之自反頑戰鬥，隊伍再渡江後，爲了一個時事問題而和馬×鬧得臉紅耳赤，張××說他「大革命」，我自然非常同意。從此教員室和隊部的本位主義鬧得更爲明顯，嚴重發展到教員室裏的同志見了馬政指睬都不睬。宋××同志來八隊工作，教員室素來是充塞自由主義氣氛的，以他的工作的積極性和生活的嚴肅性，引起天×、田××和我三個非黨員的排擠是無怪其然的，而主要的責任應該由我負擔。在八隊工作的全過程獨立性鬧得非常厲害，不但上不和行政支部取得聯繫，而且在各組文化課的教育行政上也是自成系統。在我意識上還存在嫉忌的意味，這又是自高自大的英雄主義的另一種表現。對組織的認識仍是敵對的，以爲連隊一切都由支部保證，連俱樂部主任是支部審定的，所以對文教工作範圍以外的工作，一概置之

不管，埋頭啃理論，由於張××的學習精神，激起了我對新智識追求的慾望，由此精神有所寄託。值得指出的是在大通鎮整訓時，軍首長的輪流報告，引起我對革命前途有希望的信心，鬥爭意志有了初步奠定，由此而更助長學習的情緒。當然學習觀點是以個人主義爲出發點，還沒有知道學習理論的目的是爲着指導革命的實際。但不能否認由於學習客觀上起着推動自己進步的作用是很大的。

八月學校重新編隊，組織決定我到二、三隊去學習。後因梁××同志有病須休養，上面又決定我到一隊去担任教課，我認爲組織上「有事有人」，怪話大發，牢騷滿腹。在這一段工作過程的表現是「文教工作的自成局面」，除開文教工作範圍的會議以外其他一切政治教育活動，一律堅不參加，大有潔身自好之概。一隊工作幹部能力及鬥爭歷史上都比我強，因此在精神上築起一道防禦線，關於工作的聯系，商談，除了與冒文教外，一概絕口不提，以商人手腕應付楊李二隊長，但在觸犯自己風頭主義的鋒芒時，即展開憲意的論爭。在下面的聯系上，更進一步的發揮了「譁衆取寵」之心，和同學相處則在任何場合都是「誇誇其談」，但絕不提到原則和立場。強調取消「教與學」的對立，在課堂中公開宣佈：「文化課是只有民主，沒有集中的」，以致引起在學習中的盲動現象，毫無實事求是的工作態度，基本原因是以個人英雄主義的立場出發，「工作攪得完滿會使人最痛快」的這一觀點去工作的。平時受不起挫折，在一隊後一時期的地理課，因爲自己地理智識差，接連提出不願担任甲組課的意見，認爲課上垮了，應該上級負責，爲什麼不了解我一下呢？但主要的成因還是風頭主義的意識作祟；地理課上去，對自己的威信有關。其次一個原因是工作與學習的對立，在這時期中埋頭在馬列主義書籍中，大背教條，由此不願負擔重要的課程，十足爲「馬列而馬列」的學習方式繼續了有半

年之久。自此以後，就有些自滿自足以爲有了理論資本作後盾，使自己惡劣習性「誇誇其談」更爲囂張，文致與文教間的本位觀點鬧得非常嚴重，同樣還存在着「幸災樂禍」的心理，有一次故意和鄧×鬧翻，爲了一張紙板問題，扳起臉孔，爭吵的結果我宣佈二人永遠斷絕關係，純粹是一種商人意識的狹隘性的表現。和王×同志工作時間雖並不長久，但亦鬧得感情破裂，對他向我提出「關於羣衆的意見」給予不正確的批評，自以爲是的作風反而認爲王×在「吹毛求疵」。由此在生活及言論上找到岔子就要衝突，兩人的關係會臉紅過幾次。在這一工作過程中由於同級幹部的資望高，使自己的自高自大的個人英雄主義不得不採取另一種形式表達出來，把自己沉溺在悲觀主義的學習領域中去。一隊工作最大的收獲是對黨有了新的認識，現實告訴我，黨員並不是我過去的想法一樣「連放一個屁都要會報」的錯誤體會，同時亦漸漸了解黨底使命是爲了解放全人類及全中華民族，因此對黨的懷疑與歧視漸漸消滅，但正確的觀點還是沒有建立起來的，由於過去生活的教養太根深蒂固的緣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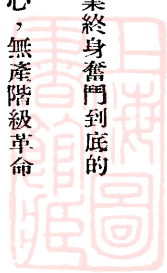
正如劉少奇同志所講的一樣，「加入本黨本軍的人，不只是來自社會各階層，而且是帶着各種不同的動機和目的而來的」。由於社會的黑暗，在生活的鞭撻下面，給予自己的痛苦太深了。經過重返上海這一段生活鬥爭的事實才體會到，如果要在社會站得住腳的話，沒有金錢和地位作爲後盾，「出人頭地」的想法是不能兌現的。因此，我第二次激起「執戈衛國」的意志，雖然是從痛苦的生活所給我的壓力，國際局勢明朗化的刺激，但基本的出發點，是想當一個上校以上的軍官，或發一批大財，通過民族解放的途徑，奠下自己的「安身立名」的基石。所以參加本軍純粹是偶然的事情，本來的目

的地是八十九軍，因為路費無着，不得不暫作安身之計。

由此目的出發的參加本軍動機，意志當然是動盪不定，那裏會有爲無產階級事業終身奮鬥到底的忠誠呢？關於參加革命後思想演變的過程可分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三旅教導隊至八隊）在自己的意志上還沒有永遠在本軍工作的決心，無產階級革命是要得的，但這不是我的事。這一個階段是在八隊工作以前，由於本軍的生活艱苦，享樂機會是沒有了；由於本軍組織的嚴密，無從建立自己生活勢力圈，地位和名譽也無從鬧起；由於本軍的人材濟濟，使自己的領袖慾自命不凡的英雄主義同樣無從表露，真是「既無名又無利」，和自己參加本軍的升官發財的動機完全矛盾。因此在八隊工作以前，自己的意圖上是「抗好戰，回家去」，做一個革命同情者罷，年紀並不小了，吃苦是不行的了。

第二個階段（一九四三年八月八隊工作至輪訓班），因生活上已成習慣，雖然有時還因沒有煙吸而感煩悶，痛苦，但已能用理智去克服；且由於在大通鎮軍部各首長的輪番報告，深刻認識了黨的力量偉大，認識了社會歷史發展的方向；更由於在一隊工作中實際體會了組織的作用，剷除了過去超階級的心理，雖然程度是膚淺得很；也由於自己在理論上的鑽研，雖然是個人主義的立場和觀點出發，準備學好了作爲再回上海時的生活鬥爭資本；不過由於孜孜不倦的理論學習，對無產階級的革命事業，有了了認識，並且有了信心，這一點不能不加以相當價值的估計，而且本校自去秋展開的「反不良傾向」，以及年終的「自我鑑定」兩次偉大的思想教育，亦影響了我改造自己的意識；但在這兩次運動中，我還是出於應付和裝「門面」的，認爲自己太複雜了，自己把自己圈定爲一個「不可樂



救」的對象，沒有信心和勇氣趕上這歷史的火車頭的先進行列中。於是產生悲觀失望的情緒，「算了罷，就是這個樣子了」，要求組織上對我估計低一點。總之在輪訓班整幹部政策以前，在意識上還沒有肅清悲觀主義的氣氛。這裏應該分析悲觀主義的產生根源還是一種變相的個人主義，客觀真理老老實實的告訴我，再要把自己的幸福建築在剝削別人的基礎上，歷史的威力一定會打自己的屁股，這私有觀念的人生觀是一種錯覺與幻想，是一種人生煩惱與痛苦，所以對悲觀主義的分析與批判使己對社會歷史的認識前進了一步，對階級與黨的偉大使我也有了較深刻的了解，我不能不承認這是一種轉變，而且是推動自己向共產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轉變的必經過程。在自由主義以前，我還沒有勇氣來翻一下自己過去歷史，想把它打埋伏打掉罷！這真是小資產階級的虛榮心，愛面子的流露。

根據上面的敘述與分析，參加本軍來的思想演變過程是從一個具有濃厚的個人享樂主義者，在黨的教育下培養下使自己通過不合現實的悲觀主義而轉入科學的人生觀的方向上去，在目前，這自然還只是在萌芽階段。

參加革命後表現在私有觀念的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的鬥爭過程，其具體表現如下：

一、自高自大，自命不凡的個人英雄主義。

這是我個人主義最嚴重的表現，參加本軍的動機本來是要想「向上爬」，但是現實告訴我是不能的，由此而產生悲觀失望的情緒。其主要的表現：一、為自己的威信而工作，不論在三旅教導隊任俱樂部主任以及直至一隊工作為止，工作的立場是以自己的願望為出發，認為工作攪得好就能在面前炫耀一下，由此產生對政治工作者的對立，和王×、郭×、馬×鬧翻幾次，以為這幾位政治工作

者，都是「言語無味方法八股」：在工作關係上是遠而避之，認爲政治工作者是不懂「文化教育」的ABC的。二、也表現在唯我獨尊，什麼事只有自已好，對過去「相互聽文化課」的意見到現在還深深印在自己的腦海裏，對張××提出關於聽了「李會長」以後的意見極爲不滿。相反的在聽他地理課時，就玩起商人手腕來了，開會時滿口稱讚不止，回來時在路上就和鄭×同志談：「張××這傢伙連一句話都講不完整，還要誇誇其談的自命不凡，我真替他可憐」。關於×副主任的整風報告一向表示不滿，「比劉副校長差多了」，這句話時常會流於言表的，認爲聽這樣的報告，還不如自己去翻翻哲學辭典。三、在與人關係上，只要人家能稱讚我說：「劉×的理論還不差，」就沾沾自喜。反之如果公然指出我的學習是教條式的方法，我便毫不容情展開辯護自己的論爭。即使是我所崇拜的張××和張××兩同志，亦經常會因此發生言語上的爭執。在態度上盛氣凌人，一無同志友愛的表現。在言語上尖銳刺人，流於刻薄挖苦，使人望而生畏，都是個人英雄主義所造成的後果。

二、個人主義在組織問題上的表現爲宗派主義。

截止一隊工作爲止，對組織的認識，一直是不正確的。「支部書記」這一個名詞曾引起我的驚奇與注意，知道了政治指導員是代表黨的，在精神上就築起一道防身陣線，和政治工作者談話，必須「火燭小心。」由於這一錯誤認識，產生了在工作中許多不應有的毛病，其實際情形：（一）在三旅學習時歧視黨員和青年隊員，認爲他們連放一個屁都要會報告的。到教導隊工作接連和三個政指處不好，同樣是我的宗派性在作祟。（二）在八隊工作和宋××鬧無原則糾紛，同教員室和隊部的對立，在一隊的自成局面的文教工作，完全是本位主義的具體表現。（三）正由於對組織認識模糊，對一切

組織裏的同志都投以疑忌的眼光，因此，和平時接近的對象大都犯自由主義的多，在三旅無意識的拉攏上海人的小團體，對工農同志看不起，認爲粗蠢得要死。專門歡喜鑽具有小資產階級情感的生活空間，自由主義空氣越濃厚的場所，越是跑得勤。產生宗派主義的根源是過去狹隘的生活經驗（善於建築自己的經濟勢力圈）的舊習性在作怪，不懂得如果沒有黨的嚴密組織，便沒有辦法負起歷史的革命使命，不懂得一切部門的工作環節都是集體組織部分之一，但是爲着同一目標而一致努力的，並無彼此可分；不懂得善於團結幹部是使工作做好的前提，一切因人因事的工作方法，是舊社會的處世手段，革命部隊裏是不必要而且也是行不通的。

三、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也表現在可恥的享樂主義和地位觀念上面。

在丹陽延陵的動搖基本上還是苦吃不下去，工作關係不好是次要原因。因爲文化教員工作沒有地位可鬧，還不如軍事教員的威風，開頭的工作熱情還高，但至八隊後就感覺工作缺少興趣，地位觀念油然而生，工作情緒大大降低。在日常生活表現上最顯明的是沒有煙抽就感覺煩悶。有爲肉貼而願當文教的言論。因生活艱苦，由此引起意識上的波動是常有的事，不願回旅教導隊或四分區去工作，主要的原因是「吃親子」。最近經濟制度上規定，連隊担子只挑行政首長及軍政教員的背包，不禁憤怒填胸，公開宣佈「文教和文書是同一等貨」的怪論。這種種表現完全是小資產階級的絕對平均觀念，從未在整個集體利益上着想一下，不了解個人利益是和黨的利益一致的，不了解人民已經在慘澹的戰爭中負擔了七年，而且艱苦的生活作風是本軍的傳統，一個革命者是沒有什麼個人地位可計較的，全於建築在發洩私慾上的享樂觀念，更是一切剝削者損人利己的行爲，一個真正爲全人類勞苦大眾利益

着想的革命者，是不應當存在這種觀點的。

四、個人主義表現在生活散漫言語荒誕的自由主義方面。

雖然已經整過自由主義，但的確是有意識地無意識地犯着自由主義，這真是叫做「自己對自己採取自由主義了。」具體表現在：（一）過去對整飭軍風紀，抱着消極對抗的辦法，「文教要打綁腿，這是突破三旅文教的老例」，「扣風紀扣簡直是束縛自己的頭頸」，這些舉例還只能算是枝節的表現。（二）在言論上更是荒誕不羈，信口開河，如過去曾檢討過的「四大名旦東行的故事」，對「×參謀長的惡意批評」等等。在輪訓隊我是喜歡製造標新立異的空氣的，如：甲，和楊××的幾次開玩笑，翻造近乎下意識的故事，自己意識上存在着宗派觀點和風頭主義，認爲這個小傢伙，一臉正經的擺起學習做模範面孔，夠什麼資格，曾因此而波動二班的學習情緒。乙，自標榜自己是一個自由主義者後，接連提出願意做一個「折衷主義者」，「整風學習積極份子應該由黨員去做」，「我是半條心的幹部」，以及「當文書去」，及以後提出「像我這樣的幹部，還是開除軍籍罷！」這許多怪論調反映出自己過去生活上的自由主義氣氛濃厚程度，而且還滲透着不願上進的悲觀主義的意味。丙，在態度上的不大正派和言語上的荒誕已經是密切聯系起來的。雖然設身在這改造思想的革命洪流中，但對於原則和立場的問題仍然認爲我是無關的。「馬列主義的面孔，跟我少來一些。」這是我經常歡喜對冒×同志提出的，由此我曾給冒×同志按上一頂「公式主義」的帽子。（三）過去工作態度本來是一個人興趣第一，認爲自己是一個非黨員，政治上的要求自然要低一點，工作上的要求，也不能和黨員等量齊觀，生活上的要求是更要特殊一點，由此觀點出發，自由主義作風便有了物質基礎，

在目前已成了一種堅不可拔的習慣了。自己亦懂得了自由主義的危害性，但還是對自己採取自由主義，如果要使自己進步，必須用極大的力量來克服這一缺點。

五、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在學習上的表現是教條主義。

確定自己學習的目的是，一、準備抗戰後回上海去作生活鬥爭資本。二、準備作誇誇其談的論戰資本，這一觀點和英雄主義是有密切聯系的。爲此目的出發的學習動機當然沒有爲改造自己實踐的意圖在內，所以在整風學習中會有許多不正常的表現。

正如冒×同志向我提出的意見一樣，「你的學習觀點是個人主義的想法」；亦正如蔣××同志向我貢獻的意見，「你所以向文藝方向學習，動機是不正確的」，這兩個意見真是一針見血，非常透澈的。馬列主義之所以偉大，是在於能指導實踐，改造實踐。但我的學習理論，基本上還是想要脫離實踐，目的是「爲理論而理論」，這種教條主義的學習是不合實際要求的。在以後的學習方法中應取消這一不正的態度。

參加革命後種種形態的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已如上面所檢討。這一過程是集體主義和個人主義的鬥爭過程，二年來在黨的不斷教育之下，不但使自己認識過去的人生觀是應該受到歷史的否定，而且已有力量來開始改造自己，雖然在改造自己的過程中還存在着敵對的非無產階級意識，這是二十幾年社會給我的教養所形成的習慣，不過我是有明顯的進步的，具體的例證就是這本「反省筆記」。

現階段的自我認識

我自投入思想革命的洪流中，時間雖只有三個月，但收穫是非常鉅大的，其最明顯的戰果有三，即是：

第一、有膽量來清算自己的生活歷史，敢暴露自己；同時把握了自我批評互相批評的武器。正如自己在反自由主義中的檢討一樣：「過去對自我批評及互相批評是深惡而痛絕的」。正因為有能力把握這個武器，所以在整風過程中，接連提出：「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馬列主義武裝我還早得很」這許多論調，一方面表示對自己的前途產生悲觀失望，但另一方面也顯露出對自己的認識深刻。

第二、進一步的認識了組織，基本上已肅清對組織的懷疑，同時也願意給組織了解我自己的生活歷史。認識了黨的政治路線，就是無產階級應走的道路，也就是全中國極大多數的勞苦大眾及各階層應走的道路；跳出過去超階級的立場，以為無產階級革命是要得的，但我應該是做一個革命的同情者，因為年紀已經老大了，不應當再吃辛苦了；確定了鬥爭意志，再沒有「抗好戰回家去」的意圖了。

第三、由於一次一次的反省，更認識了現實社會是痛苦的黑暗的，重回舊的生活圈子裏的信心和慾望沖散了，由此而產生了新的要求，要求自己「在生活歷程中來一次重新決定「生活目的」的人生觀，雖然一度淪入悲觀主義的歧途中去，但在黨的偉大教育力量下，終於又把我重新拉到新的方向上去。在自己整「幹部政策」時，我才提出了第一步應該澈底確定自己的「立場」，把自己看做一個超黨派，超階級，超社會的「超人」，這是一種幻想，這是一種特權階級的想法，現實的社會是沒有基礎存在的。這三點是整風學習的進步，但同樣還存在着嚴重的缺點；其實際情形；

第一、開始來隊整訓時，聽到打哨子就頭疼，以後慣了，可是又擺起「老油條」的架子了，小組報告時，躺在鋪上開會。一人輪訓隊學習，觀點上是學習政治理論的，因此開學第一個星期，我完全埋頭於抄筆記。整自己主義後，我強調課外消遣，一定要看文藝書，拿上面的規定當「耳邊風」。生活上的散漫，隨便，自隊伍離開龍崗後，軍風紀便丟在腦後了。同時享樂意識集中地反映在香煙問題上，香煙一告斷絕，怪話也隨之大來。這是在行為方面的。

第二、在言論方面的：整自由主義後收到一些反映，馬上接連提出「整風折衷份子」來標榜自己對整風的態度，意識上以為積極份子應該由黨員去充任，以及連續提出：「半條心，馬列主義武裝我還早呢，當文書去的工作方向，像我這樣複雜的對象，還是開除軍籍罷！」這許多言論的根據，就是上面所指出的悲觀主義，就是本人對自己在革命行列中失去信心的內心反映，就是整風學習情緒的動盪表現。這是我的個人主義另一種表現形態。至於在一般言論上的飄忽無定，態度上的囂張，輕浮，更顯然是過去商人意識的作祟，已形成了一種堅不可拔的習慣了。

關於養成我的自由主義者的思想根源，其歷史發展情形如下：

第一、資產階級教育的結果。幼年學生生活時，已懂得三民主義是什麼了，對孫中山先生的「實業計劃」，「總理學說」，是崇拜得五體投地；認為「知難行易」的哲學是指示實踐的方法論；有一個時間（十八九歲），曾在自己的友人羣中，宣揚這一「智者治人」的唯心哲學。五權憲法亦認為是世界上最最好的一種民權。「平均地權，節制資本」的民生主義同樣認為是適合中國國情的改良主義。

由於對現實社會的認識不夠，對孫中山先生所提出的「中國只有大貧小貧之分」的曖昧但實在是錯誤的分析，亦以爲很正確，因此對大革命以後的十年內戰，「共產黨」，在自己當時的體會上，因受了國民黨宣傳的影響，亦認爲是「殺人放火」的。

第二，受國民黨宣傳的結果。我在中國的第一大都市生長壯大的，國民黨在上海的文化統治當然是十分嚴密的。因此對「蔣介石的迪克推多全權領導」，認爲是很正確的一種辦法，因爲「議會制」在今天這樣國際風雲動盪的局勢下，是不能解決問題的，認爲蔣介石是中國唯一的領袖，在西安事變以前，還只是信仰，但自抗戰開始後，便轉爲崇拜了。對「安內攘外」的反動政策，同樣以爲是很正確的，「自身沒有健全，怎能有力去應付外敵呢」。在這時根本不知道什麼「無產階級」革命；雖然由於接近進步書報的緣故，嘴上也會講一套「普羅化」或者是「工農化」，但這僅僅是裝璜門面的漂亮話。在未參加本軍前對「無產階級」這個名詞的認識，只是貧苦的窮人而已，至於無產階級的世界革命，意識上是模糊的，對無產階級的同情也是基於「悲天憫人」的特權階級的道德觀。

第三，參加友軍後所得的影響。友軍里面每星期都有一次「總理紀念週」，教育影響不可謂小，尤其是友軍對所謂「領袖」的信奉，更是淋漓盡致。因此，基於過去在上海的認識以及在友軍親身實踐的教育，相信三民主義，以及能使中國國富兵強，也只有依賴「領袖」的領導。

第四，過去接近進步書籍不多。由於基本上自己的政治思想既如上述，所以對一般革命理論書籍，就是接近了亦以爲是「過激的革命論」，而且我在二十二歲時，曾一度沉浸在保皇黨巨擘梁啟超的飲冰室全集裏，以及爲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思想的著作「天賦人權論」等的自由主義思想薰陶，

因而在自己的人生觀上標榜「不自由毋甯死」的標幟。

我之所以提出我是一個自由主義者，這就是說我不是一個共產主義者。這道理是非常淺顯的，因此依據這種人生觀的我，那能在這共產主義武裝下的革命行列中，會不產生似上而所檢討的各種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呢？

只知講究個人「享受」，爲了「聲色利祿」，爲了個人的私慾而患得患失，這是剝削階級人生觀的特點。這種自私自利的人生觀，是和共產主義相反的，而且是共產主義者的思想敵人。

在目前我不但應該從歷史上澈底清算自己的種種惡濁的生活觀點，而且應該用極大的毅力和決心，來克服這些錯誤思想，應該跳出自己所築成的，已經是反動了的生活領域；並且還應該認識「儘憧憬未來而不把握現實，這是小資產階級的幻想」！

以後的改革方向

個人的真正價值是：在於爲社會歷史上最進步的階級服務，爲社會歷史正在發展着的新方向服務，爲最大多數勞動人民服務。應該了解中華民族的前途，就是個人的前途，無產階級的革命前途，就是個人的前途。捨此以外，所謂個人的前途，是不可能而且根本是不存在的，因爲現實的社會是存在着階級的，如果不突破這一痛苦生活癥結，一切美滿的生活理想，不是特權階級的思想反映，就是小資產階級的幻想。

由於自己在認識上的進步，目前對自己的「改革」自信已有能力，而且必須着重指出，在黨的偉

大指導下，一定會使自己的「認識與實踐」統一起來。當然不會否認「自拔」是一個嚴肅的戰鬥，是一個不斷堅苦的鬥爭過程。但自整風學習後，這一在思想革命上的巨大戰果，截至這篇反省筆記完成時，我的個人主義一種表現形態，「悲觀主義」，基本上已完全肅清。這是使自己進步的一個重要因素。

認識的標準須要用實踐的準尺來測度，種種色調不同的，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在目前還存在的，其最嚴重的有四，即：

- 一、對組問題上的宗派主義，
- 二、已經腐化了的個人享樂主義，
- 三、言論荒誕，行爲不羈的自由散漫主義，
- 四、在學習上的教條主義。

至於自高自大的英雄主義，自然是嚴重的一種惡劣傾向，不過以目前自己的認識與體會，以爲英雄主義已開始轉變爲另一種表現形態，即：「當文書去的工作方向，開除軍籍罷。」之類的與人無爭的悲觀主義方向上去了，同樣地位觀念和平均主義是和個人享樂主義分不開的；爲此如果能澈底把上述的四種惡劣傾向剷除掉，其次的三種表現同樣是會失掉它的「陣地」的。

今後的改革方向究竟應該是怎樣呢？

第一、關於澈底克服宗派主義的實踐要求要：（一）一切以集體利益爲前提，幹部與幹部之間的關係應該顧顧別人，多替人家想想，眼光放遠點，胸襟放得寬大，同志與同志間的態度也應該以無產

階級的立場無條件的幫助人家，愛護人家而同時也應該向人家學習。（二）既然認識了「團結」是工作做得好的第一個條件，就應當在實踐工作中去付之實施。

第二、關於澈底克服個人享樂主義的實踐要求：（一）確立正常的「享受觀念」，應該確立廣大的階級享受，和大多數勞動人民的享受統一起來，這種享受才是真正的享受，才是無產階級正確的享受觀。（二）去掉目前支配經濟不平衡的焦點，把個人的經濟預算，做一個適當的支配，應該不超出自己的津貼實範圍，應以極大的努力來克服「今朝有酒今日醉」的頹敗作風，因為這種作風，基本上是一種動搖不定的現表。

第三、關於澈底克服自由主義的要求：（一）提出「沉默運動」，但這並不是消極的沉默，而應該是在未開口以前先想一想，是不是由於情感沖動了要給人家無的放矢，或者是一己的喜怒發牢騷而無原則和立場的「亂彈琴」。（二）生活的規律化，合乎軍隊要求的生活作息，以制止從無規律的散漫生活。

第四、關於怎樣克服學習上的教條主義，正確的把握馬列主義的學習方法，放棄為「理論而理論」的學習態度，也不是作為「誇誇其談」才學習的，為了馬列主義在中國的具體應用才學習的。

我有信心完全自己所指出的改革方向，因為我已經在巨大的戰鬥中被教養了出來；因為我已在黨的教育之下，得到改革自己，這是我自己生命史上的第一次最大的收穫的轉變。

在整風中鍛鍊自己

第一部份——從家庭到社會

我的家庭成份是一個上層小資產階級，我父親的職業是多變的，兩次向上爬的企圖，都沒有獲得成功。在這樣一個小資產階級的家庭裏，自幼養成了我對個人利益，生活瑣事患得患失的自私自利意識。同時家庭的經濟也不寬裕，使我逐漸懂得保守，自私，經濟上打算盤，而我整個家庭經濟生活的「籌謀」，「打算」的習慣，更加强了這一點。

在小學裏，我愛上了傳奇小說，家庭生活的孤獨，更促成了埋頭讀書的習慣。在兩年的時間中，我幾乎沒有脫離過劍客或傳奇俠傳。書坊中的傳奇小說，差不多我都看過。當時傳奇小說對我的影響是極深刻的；我甚至可笑地模仿那些修行，打坐的舉動，對女色仇視。在思想上，我產生了強烈的正義感，我的抱不平，對窮人與被壓迫者抱同情，對貪污腐化的行為深惡而痛絕之。在一個時期中，我看見叫化子不得不給錢，叫我坐人力車我不願意坐，覺得人拉人坐是太不平等了。這個却富濟貧，好打不平的俠士英雄的人道主義的想頭，對我後來思想上轉變為左傾是有很大影響的。

十四歲，一九三三年，我考進了省立上海中學初中部。這是在上海最有名的學校，校舍之完美，偉大，是遠東第一個。但與社會可說是隔絕的，學生的思想完全控制在官方之手。我脫離了家庭，住



在學校裏，這使我在生活上，思想上別開了一個完全新的天地，我跳出了狹隘的，受拘束的家庭生活圈子，跑進了一個活躍的，集體化的，單純的學生生活中。進了這樣一個「漂亮」的學校，我以為很幸運，對於政府的對青年教育的「關心」，引起我的尊敬。我覺得應該好好讀書才能對得起國家。

在課外的讀物中，我繼續地培養着人道主義的觀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愛的教育，苦兒流浪記，錢等等作品。這些書，我有時讀到悲苦時，時常要流下同情之淚來。

三年的資產階級的學校生活與教育，在我腦中建立了自由主義的思想體系與愛國觀念。今天檢查起來，雖然後來自己的思想有了轉變，但自由主義的一些基本觀點，在我腦中還是根深蒂固的，這表現在下面幾個觀點上：

第一、個性第一主義。在校中，我們的思想與行動的原則，便是以個人的個性，興趣，愛好，習慣為準則的。每個人有他自己的特長，每個人有他自己的志願，每個人有他自己的發展方向，活動範圍的「自由」。當時我很信賴「科學救國論」，所以我立志做一個科學家。

當我參加革命時，是以「做個技術工作者」的條件來入伍的。我沒有想到任從組織的需要來分配我的工作。

當我入伍後，感覺到軍隊的「枯燥」，「限制個性」，「埋沒特長」時，我便認為軍隊不適合我的個性，幻想暫時不得已當個文化教員，將「我還要脫離軍隊，去做適合我個性的工程師的。

第二、超階級的，抽象的「平等」觀點與無原則的自由權利。主張無原則的「互相尊重」，「自由發展」，無原則的反對「強制」。這些觀點，深刻的存在我腦海的深處，嚴重的影響了我入伍後的

自由主義的錯誤，如「一團和氣」，「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明知不對，少說為佳」，放棄思想鬥爭。

當時我的愛國觀念形成的根據是學校的歷史、地理、與三民主義的教科書，九一八，一二八與日寇步步進犯的事實。尤其是每星期一的紀念週，校長與外來學者的時事報告，演講，對我們思想影響很大。對於舊社會，我只抬着抽象的不滿，只覺得是個貪污腐化，吹牛拍馬，自私自利的垃圾坑，那時一些中國電影（如桃李劫，人道等）給我的認識是：舊社會充滿了卑鄙醜態，而對於中國及世界的實際政治形勢則茫無所知。

自從我進了中學以後，父親對我的關心有了很大的轉變，特別是當他向上爬的企圖第一次遭受打擊之後，開始感覺到這一生的期望，只有寄託在我的身上了。他說他在社會上的活動唯一的目的便是培養兒女成「人」，他對我的期望很高，希望給我大學畢業，出洋留學。當星期日我自校回家去探望的時候，他對我愛護備至，親自為我照料衣食。這使我深深地感動，以及對父親同情，對自己慚愧，我覺得自己是依靠了父親的「勞苦」而得到讀書的機會的。這更推動我向上爬的意志，我發咒要用功讀書，將來可以謀得一個社會上層的地位，脫離舊社會的「勢利眼」，為家庭揚眉吐氣，來安慰父親。我幻想着，以為只要「安分守己，用功讀書」，將來總可以達到出人頭地的目的。

第二部份——從愛國思想到革命思想

十七歲，1933年，轉入省上中的高中部理科一年級。在這一年中我的愛國觀念，更強烈而鞏固

了。

第一、在高中部我們全部接受了軍事訓練，學校生活就是半軍事化的集體生活。比我們高一級的，受過集中軍訓的二年級，在各方面都做了我們的榜樣，校中有官方派來的軍事教官二人。

第二、國內時事的發展，綏遠抗戰（當時曾有去過綏遠前線的新聞記者來校報告），兩廣事件的和平解決，日寇在華北的公開走私，以及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這些都造成了我們對日寇的仇恨，對國家存亡的關心；從外來的「名人演講」（所謂「名人」者：包括官方的代表，和周佛海、潘公展、楊虎以及一些御用的學者，）我們聽到「讀書救國論」，我們聽到法西斯主義的宣傳，我們深深地相信了這些反動理論，我們單純的愛國觀念，被官方所利用，所陷害了。在政治上，當時我們已成爲蔣介石的追隨者了。我們認爲政府「先安內而後攘外」是「正確的」，認爲政府對日的妥協政策是由於「不得已」，（信任「現在還不能同日本打，沒有準備好」的說法。）甚至於我們對「法西斯主義」很盲目地相信它能救國；對德、意的轉弱爲強很羨慕，以爲中國應學德、意的榜樣。

這許多錯誤認識的根源，便在於：

1. 自己政治上的幼稚，對中國政治問題的無知。

2. 思想上貫地受着官方的麻醉教育。

十八歲，1937年春，我們高中一年級全體調到鎮江參加第三屆全國學生集中軍訓三個月，在集訓中，我們看到了國民黨嫡系部隊八十八師（他們曾作野戰演習給我們看）裝備整齊，文化程度相當

高，民族意識很強，以及一般下級軍官（軍官學校學生）質量都相當高，都是中學生。改變了我對舊軍隊的認識，因而增強了我對政府的信賴，在這裏，我們又聽到德國顧問的演講，陳果夫的演講。我們接觸到的班排長，都是江西特別軍官訓練班的學生，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在我們腦中是更深刻了。

在集訓中途，我們同學中大部參加了復興社。

當時我參加復興社，有如下幾點思想：

1. 我害怕參加了這個團體會拘束了我個人的自由，會受官僚政客の利用。
2. 我不喜政治活動，我的志願是做科學家，不願參加政治團體，但是，
3. 我又認為參加這樣一個祕密的「救國團體」，是很光榮的，我的愛國觀念作了這個思想的支援。

4. 在當時半強迫的條件下，我不敢拒絕他們，否則，我怕會受處罰，高中的畢業文憑怕會被扣留，所以終於沒有拒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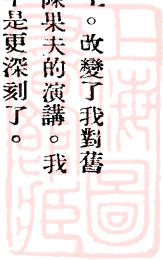
參加復興社以後，在集訓期間並無活動。

七月底我們回到上海，不久便爆發了「八一三」的抗戰。

「八一三」上海抗戰的事實，似乎證實了我過去對政府的信賴是「正確」的，當時我也以為政府的抗戰態度是「堅決」的，並且盲目地對前途抱樂觀的看法。

回到家以後，在內心裏引起了兩個苦悶：

第一、我開始意外地發覺我父親與親戚們的思想已經與我的思想大相徑庭，我在四年的學校生活



中，在思想上，已經與他們完全對立起來了。他們那種缺乏民族意識，落後，迷信，自私，享樂的思想與生活，使我大吃一驚，隨即悲觀失望起來。對於那些在抗戰中依然花天酒地，而募捐時却不名一文的态度，（我家及親友也差不多）真使我怨恨之極。從此我對父親的情感與態度日趨淡漠，以致到輕視，敵視的態度。在我我感到很大的苦悶，對他們不進行說服教育，以爲他們天生如此，無可藥救。

第二、我抗戰熱情很高，但却無處發洩，學校在市郊，無法開學，同學都閒在家裏，復興社與上級的關係脫離，我覺得救國無路，只躲在家裏看報看書，父親也不允許我在外亂跑。

十月裏，學校開學了（在租界裏），同學們又在「讀書救國」「將來爲國建設」的口號下，進入書本的研讀中。

大概在當年冬季，復興社上面派了人來召集我們談了一次話，鼓勵我們抗戰信心，可是並無具體工作分配給我們做，同級裏有半數以上的同學都是復興社員，在事實上已是公開的了。當時分過小組，討論過時事，募過捐，但終於消沉下去，大家還是保持了埋頭讀書的空氣，記得復興社負責人曾說過這樣的話：

「參加的人不一定要對政治活動有興趣，也不一定強迫你們放棄原來的志願，你們喜歡做什麼工作的，還應該努力於原來的的工作，等到學成之後，政府分配你們適當的工作地方。」因之，這更使政治上少興趣的人，不參加任何活動了。

一九三八年夏季暑假裏，我們自己在一個思想左傾的同學×××的活動下，組織了漫談討論組，

我們常到他家裏去，讀些時事以及社會科學的基本問題，青年問題，但那時對這些問題都生疏得很，只抱着好奇心，聽着他的意見，而我們自己却並不引起研究的興趣，因之我們的思想也並無改變。

開學以後，又是埋頭讀書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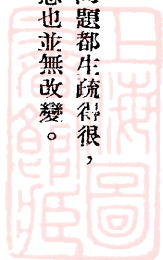
不久，來了解散復興社的消息，復興社員改編入三民主義青年團，但允許自由退出；我趁此機會退了出來。

爲什麼我退出復興社，拒絕參加三青團呢？因爲我感覺復興社對我是一種約束，是一種負擔，對我並無好處。雖然後來想，參加復興社，將來謀自己出路可以有一個依靠，但我想我有本領還怕找不到職業與地位？受了拘束，反而沒有選擇的餘地。特別是我感到對政治活動沒興趣，而事實上參加復興社以後，又沒有看到什麼成績，徒然浪費時間與精力罷了。

雖然退出了復興社，然而在我思想上却依然是反動的思想，這表現於：

- 一、對蔣介石與國民黨政府的信任，認爲是堅決抗戰的。
- 二、對共產黨活動不滿，對共產黨的機關報譯報表示輕視。
- 三、對左傾學生活動份子表示輕視。

我對共產黨的實際活動是完全無知的，但是由於國民黨當局的反動宣傳以及上層社會的傳統觀念，我的想像中，共產黨員是一些「輕舉盲動」，「沒有知識」的「搗蛋份子」，對於救國會派，我原來也是這樣看法，以爲他們「亂叫亂吵一頓」，不顧當時是應該信任政府，「集中力量」，「準備抗戰」；而抗戰後，則應「集中力量」，「進行抗戰」，而不應「奢談民主」，與政府「對立」。至



於對於共產黨的主張與言論，我也不願平心靜氣的去研究，以成見對之。

對於左傾的學生，我總以為他們是受了少數人的利用，而進行搗亂的。特別是因為我所見到的幾個學生讀書不用功，程度低，私生活浪漫，態度傲慢，更使我看不入眼。我認為他們都是些「輕浮」，「不務實際」，「喜歡出風頭」的傢伙。

在今天來看，我參加復興社後，對於以後在革命隊伍中還有什麼特殊的思想上的影響呢？如果看了上面我所寫的當時復興社所有的活動經過，那末便應該知道不會有什麼深刻的「特殊的」影響了。因為，事實上復興社的活動（指我們這部份人）在當時存在於停止狀態中，上面也根本沒有具體的工作分配下來，加以「組織」上又是脫離領導的。然而正因為我曾經參加過復興社這一事實，當我入伍後，又遇到組織上的懷疑，心裏便時常懷着鬼胎，只怕黨對我的政治面目懷疑，影響了兩年來自己思想上的不進步與工作上的膽小（當然並不是主要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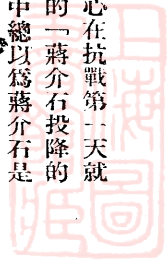
但是，也無可否認，過去我所受到的國民黨的宣傳教育，一直到我入伍前後，還存在着某些影響，如：

一、入伍以前，我對中國共產黨的主張，活動以及過去歷史基本上已經有了清楚的認識，並且寄予莫大希望與信任。但在我腦海的深處，由於沒有親眼目睹到共產黨的活動，還存在着「一絲懷疑」：此共產黨員到底是不是真心為革命的呢？所以入伍時還帶着一種「看一看究竟」的念頭。當然，這一個疑問，一部分也是受了矛盾的一些描寫大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的動搖性的小說的壞的印象，以及看到上海學運中一些活動份子中的風頭主義而產生的。

二、就是在入伍以後，直到輪訓隊的時事學習以前，我總以為蔣介石抗戰的決心在抗戰第一天就下定了的，以為他非到萬不得已，是不會投降的。因之，對於過去我們所歷次提出的「蔣介石投降的企圖」的時候，我總解釋為我們的「策略運用」，其目的是爲了爭取羣衆，我內心中總以為蔣介石是不會自動投降的。這個錯誤認識的根源：第一、是遠於抗戰以前自己所見到的國民黨下級軍官的抗日要求及八十八師中的民族意識的假象，便以為蔣介石早就下決心抗戰了；而不知這不過表現國民黨上下層的矛盾，這是他不得已而爲之的，否則他便無法取得下級與軍隊的信任和擁護，而國民黨下層與軍隊中民族意識却不是蔣介石的民族意識。因之抗戰初期，國民黨軍隊的流血犧牲的英雄精神，也只能證明國民黨某些部隊的民族意識的強烈（如八百壯士），但却不能說這就是蔣介石抗戰的決心，事實上，他不久就在南京接受敵人議和的提議。第二、一直還認爲抗戰前蔣介石對外妥協的目的是爲了爭取時間抗戰，爲抗戰作準備；而事實上這也是他們的欺騙宣傳，其實是爲了集中力量消滅共產黨，抗戰後的幾次投降企圖正證明了這是假話。

既認爲國民黨部隊抗戰的堅決性是不變的，我便想不到他們會與僞軍勾搭，會投降敵人。我入伍後，在三分區時，忠救過江來與我們找磨擦，我見到報紙上登載着忠救勾通敵僞的消息，當時我是不相信的；認爲這不過是向民衆「宣傳」而已。這個錯誤的思想是在時事學習中改正過來的。

第三、由於我們所接觸到的，在我同學中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員有好些都是我所熟知的甚至是要好的同學（同在復興社中的）。我認爲他們都是些純潔的愛國青年，只不過在思想上受了國民黨的欺騙才加入了三青團，而我之進步也不過在不同的境遇中（甚至是偶然的），才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因此



對他們並無惡感，甚至爲他們可惜。這影響了我對三青團痛恨不夠。這是失去立場的想念，拿小資產階級的私人情感來對特務集團同情。

一九三八年下半年，我在高中三年級，脫離復興社不久，在一個「學協」中的同學沈×的影響下我開始轉變了。我開始從單純的愛國思想走向了共產主義的思想。

開始時，我們在爭論一些時事問題，（如張伯倫的外交政策，蘇聯的外交政策，外蒙古問題等）及一些牽連到的政治問題（如抗戰中的民主）等，逐漸地我發覺自己過去的單純的國家民族觀念的空洞，而他的階級觀點的更加深刻。我自高自大的愛面子的心理阻止不了我的好奇心與追求真理的精神。所以越是爭辯，越是發覺自己的錯誤，在爭辯中他還介紹了有關的小冊子與書籍我看，這更加動搖了我的信念。

這是一個殘酷的思想鬥爭。當我發覺我過去所奉爲「真理」的許多觀點都變成「歪理」時，內心感到無限痛苦，最後，當我整個思想體系完全垮台時，我只感到空虛，茫無頭緒，無所依靠。我想頑固地不願接受新的思想，對新的思想抗拒；但我服從真理的要求又驅使我不得不承認自己的錯誤。這是我的自尊心受到第一次無情的，澈底的打擊的一次。

在爭辯的過程中，沈×與我接近起來，他逐次地介紹了一些左傾的文藝與社會科學通俗的小冊子給我。在我思想上印象最深刻的，便是美國作家辛克萊的石炭王那本文藝作品，從這裏我第一次體會到無產階級的痛苦與社會主義的必要。它刺激我的正義感，使我自覺走上左傾的道路。舊思想體系垮台了，新的思想在建立着，我的反動思想，便是這樣開始轉變的。

真的，像我這樣一個受過反動教育的，而又是一個埋頭苦讀的學生，居然思想會轉變過來的人是不多的，許多與我相類的中學裏的同學，他們今天大多到大後方去了，或者加入了三青團了。關於什麼條件決定着我思想上的轉變呢？

一、我已退出復興社，因之除了思想的鬥爭外，便無其他外力的阻礙；否則，沈×也不會積極地來幫助我進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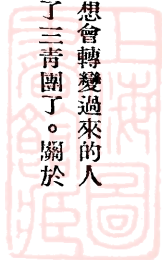
二、由於我自幼所培養了的正義感與人道主義，以及對舊社會的不滿，使我易於對勞苦羣衆抱同情，對資產階級敵視，易於接受共產主義的理想。

三、我過去之對共產黨與共產主義之敵視，既非由於切身利益之矛盾，階級利益的衝突，也不是由於在鬥爭中所建立起來的仇恨，只不過由於對共產黨與共產主義事業的無知，由於對國民黨宣傳的盲從。所以當我一發現自己過去的誤解時，便很容易放開了舊的觀點。

四、由於自己是知識份子出身，好研究，有好奇心，看到一些很用功的同學，功課很好的同學也左傾了，要想了解個究竟。當我已經發現了自己的錯誤時，像發現了一個新的天地一樣；引誘着我去發掘。而我好讀書的習慣，也幫助了我的轉變。

五、沈×的積極幫助，有系統地擊破了我的舊的觀點，他經常與我接近，也使我致不致在轉變的關鍵上停頓下來，使我的舊思想沒有反攻頑抗的餘地。

這是在一九三八年與一九三九年的冬季裏，對左傾書籍的研討開始是被動的，繼而便發生了興趣變成自動的了。可是在這一個階段中，只不過剛剛從單純的愛國觀點與對蔣介石思想的盲從中解放出



來，打破了對共產黨的成見，及對社會問題對共產主義發生了研究，探索的要求。而在實際行動上，依然是個安分守己，埋頭讀書的「正人君子」。

在三年級的末尾，爲了應付投考大學，我又放棄了對左的思想的追求，鑽到書堆裏去了。

一九三九年夏，我考進了國立交通大學的機械工程系。因爲入學成績優異，獎爲公費生。

雖在暑假期間，利用時間看了好些文藝與社會科學基本書籍。但一開學，爲了虛榮心，愛面子所驅使，我依然把自己的注意力主要地放在學校裏的課程上面了，我怕別的學生笑我，這個公費生是靠運氣碰出來的。第一學期結束，我的學業成績是八十四分多。（要繼續維持公費生的資格是八十分）。

一九四〇年春，即一年級下學期，我在沈×的介紹下加入了「學協」。

我參加「學協」是有些被動的，不好意思拒絕他的提議。我怕它會拘束我的自由，我怕工作會妨礙我的個人學習，我怕活動得太厲害了，會被學校當局處分，但當我知道參加時並沒有什麼手續，參加後也沒有什麼嚴格的規則時，我抱着「看看」的態度答應了。

參加「學協」以後，我們的活動曾有：參加學生自治會與基督教青年會的活動，或募捐，或請人演講，或散佈進步書報的影響。佈置了要求學校當局遷往大後方（反汪運動）的活動（後被校方發覺，停止了）；組織參加話劇的出演，利用暑期與星期日組織書報研究討論會，合訂進步書報，團結與影響同學等。

開始，我們的同志大約只有十個人左右，過後逐漸地有人淘汰落伍了，最後剩下來的只有五六人，我們中處於領導地位的是王××與沈×，其餘都是後進之輩。由於我們人數少、力量薄弱（三青

團比我們強得多），工作缺少經驗，我們自己本身不夠堅強，以及工作環境不順利（極大部學生，對政治不感興趣），所以我們的工作收效是很小的。

在「學協」裏約一年半的時間中，（雖然後來「學協」宣佈解散，但我們幾個老同志還經常在一起談工作，談學習），在我思想上有了很大的轉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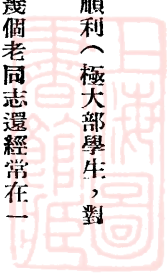
第一、工作首先是被動的，但之後便逐漸地走上自覺的道路，慢慢的我對革命工作有了一種責任感，覺得不做些進步的工作，便要感到慚愧，對不起自己的樣子。這是我後來參加「一心社」的一個因素。

第二、在自己的學習上，對馬列主義的著作如哲學、政治、經濟學都看過一些，對時事問題的認識也較清楚（有上海週報，求知文叢等刊物），加以實際生活的體會，使我在思想上清楚地認識了共產主義事業的勝利前途。這是我後來入伍的基本原因。

可是由於我當時思想上個人主義根深蒂固，思想方法更談不到正確，各方面的弱點與錯誤極嚴重，而其中大部份一直保留到今天。這大約表現於下列幾方面：

一、思想上更加自高自大，自以為是進步了，革命了。只看見人家落後，一味輕視人，但又無法改變人家，影響人家，便只能自名清高，潔身自好。

二、對工作的態度：由於個人學習與工作的矛盾，個人地位與工作的矛盾（怕得罪學校當局），始終沒有放開個人打算。在思想方面的毛病，使我把困難誇大，把對象絕對化，往往事先就對工作採取悲觀失望的態度。對人要求一下子就轉變進步，碰了釘子就悲觀失望，聽之任之了。



三、對家庭自由主義，抗戰以後，由於上海生活程度的逐漸高漲，我的家庭經濟狀況是逐漸緊縮，逐漸沒落的。自從麵包廠的生意失敗後，父親便東鑽西碰，追求着金錢。一九四〇年春，他在朋友的介紹之下，當了漢奸：在偽蘇浙皖稅局裏掛名爲科長，每星期去「辦公」一兩次，實際上近於領取乾薪。

我知道了這件事，內心裏起了痛苦的鬥爭，我想脫離家庭，另找出路。但我又沒有這個勇氣。結果還是採取自由主義態度，聽之任之。在「學協」同志面前，我始終沒敢把這件事公佈出來，當他們探問我的家庭狀況時，我欺騙了他們。

四、對個人前途始終沒有放棄做一個工程師的「志願」。所以我總希望把大學讀畢業。一九四〇冬父親死後，家庭經濟困難，我勢將輟學就業以養家。一個父親的朋友，是個漢奸（譚×，偽蘇浙皖稅局的負責人之一），自願供給我的家庭費用與我同妹妹的學費。我覺得可恥，但終於沒有拒絕。我想大學畢業後，來根據地參加技術工作，也算是「革命」了。但另一方面，我又「不忍拋棄家庭，讓妹妹餓死」；革命與家庭，是一個「無可解決的」矛盾。我對當時的現狀感到苦悶，參加革命又無決心，內心却希望發生一個什麼「事變」，讓客觀情勢的變化來替我解決這個矛盾。

五、當時對馬列主義的學習完全是教條主義的。不是爲了運用，爲了實行，而是爲了興趣，多得些知識可以誇誇其談，表現自己，自己想做個「理論家」，不做「職業革命家」，可是看到『「理論」與「實踐」必須統一』的時候又覺得矛盾百出；越是多看了馬列主義的書，越是感覺到自己的現實生活與理想的矛盾，而當自己越是對現實感到頭痛時，則又越是想逃避現實，鑽到書本中討生活。

一九四〇年冬，父親病沒以後，雖然有個漢奸可以依靠，但我繼母總不敢過於去依賴人家，怕將來欠了債還不清。家中是儘量省吃儉用的。這時，我在家庭的地位更提高了，繼母自己寫些文字投報紙副刊，領些稿費補充家用。因此，繼母希望我大學畢業以後，可以負擔起「養家的責任」，我的行動也得到更大的自由。（父親在時，我在家是有些拘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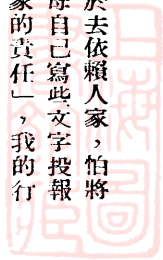
父親的死，家境的沒落，一方面使我的思想更趨「革命化」，曾記得有兩次我親自手裏拿了米袋到米店裏去買平價的米，這種事我從來沒有親自動手的（父親在時家裏用了一個包車伕）。然而另一方面，我對家庭的「責任心」更牽制我脫離舊社會的企圖。

一九四一年夏在暑假裏，由堂弟劉×的介紹，我參加了「一心社」。

當時正是「學協」解散了，學校工作沒有開展，自己對自己思想上的矛盾，（對家庭，對出路）感到苦悶，一種革命的熱情，強迫着自己要多做些進步的工作。過去我對外面的活動沒有看到過，想借此機會開開眼界看看別人是怎樣在活動，也可鍛鍊自己的工作能力。

「一心社」除了分小組討論會外，還有大組的讀書會，請外人來演講的演講組，歌詠會，夜校等，但這些我都沒有參加，連會裏的一些活躍分子全都不認得，只是到本軍後，在旅服務團認識一些。如後來誣我為托匪的嚴×與倪×，在上海時我都不認得。

當我告訴「學協」同學說我參加了「一心社」時，他們曾警告我「不要到外面亂碰亂撞，可能會受托匪的欺騙」。我並不把這話放在心裏，那時我對托匪的一些活動，（看過兩本書，如兩年來托匪罪行等）看到過從「學協」同志中拿來的托匪所出版的報紙，也常看到許多文章中斥罵托匪，與漢奸



等同。但是在我腦海中，托匪的破壞與活動並不怎樣廣泛，也很少聽到托匪破壞的事實，因之我對他毫不介意。我甚至還有這樣的疑念：許多人那樣痛罵托匪，是不是「無的放矢」？在我思想轉變以前，我認爲「托匪」是幌子，是一個草人，共產黨拿他來打靶子，來掩護自己的錯誤的。『這個錯誤的觀點似乎多少還遺留在我腦子裏。』

從我所接觸到的事實與人物看，當時我以爲沒有絲毫理由可以說「一心社」有托匪。所以我認爲同學的警告是過慮，我只當是一個進步青年的自發的學習團體。

現在看來，我那時的錯誤是由於對上海環境的複雜性的無知，對托匪活動方式的無知，便根據自己狹隘的經驗，自以爲是的看問題。所以即使那時在「一心社」真的遇到托匪的時候，也不會懷疑到他，認出他的真面目，因爲他們都不是以自己的真面目來活動的，在「一心社」幾個混進去的托匪中，如嚴×便是在「不左不右的」「進步的」外衣下活動的。後來有大批「一心社」社員參加了本軍，這些都刺激了我，增了我後來參加本軍的決心。

一九四一年一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打破了我一貫的幻想——大學畢業。（那時我在三年級的上學期）。

敵人進了租界，我的學校是國立的，學校當局並無遷移內地的表示，則其前途必然爲僞方所接收。漢奸學校我是不願讀的，對學校的工作已失去信心，自己在學校裏早就暴露了。家庭給我兩條路：第一、在上海就業，第二、到大後方去；第一條路我從來就是不願意的，第二條路，去昆明找三叔，去四川找堂兄罷！他們不一定肯幫助我讀書，而且我自己也覺得可恥，過去我曾有過的想法：大

學畢業後，學些實際本領再來爲革命工作的想頭，我覺得有些可笑了。既然遲早要參加革命，爲什麼現在不肯參加呢？遲早要拋棄家庭，爲什麼現在捨不得呢？多用了家裏的錢，最後還是拋棄不管，不是更不好嗎？

所以我便下了決心，經過「一心社」的關係參加了新四軍。

我之由「一心社」的路線來本軍，原是偶然的，因爲機會湊巧，恰巧有人到那里去擴軍，而我那時既已決定要走，便隨着他們同來。

誰知後來竟因此被牽涉到托匪的案件中去了呢？

我入伍動機的真相，直到這次整風之前連我自己都是不清楚的。——我直以爲自己是爲革命，爲了共產主義事業與解放無產階級，才拋棄了家庭與個人的前途，來參加軍隊的。這影響了我後來入伍後的自高自大，無自知之明，以致思想上的不進步。

當時我主觀上是怎樣想的呢？我自己當作一個英雄，我自己不是無產階級，但我信仰了共產主義，爲解放無產階級及一切被壓迫的勞苦大眾向舊社會宣戰，爲了達到我的理想而奮鬥。我將憑我的知識與本領來爲革命「服務」，最好是做個適合我的個性的技術工作人員，那麼對革命的貢獻也最大。

今天看來，這種以「革命」的外表來遮蓋個人主義，來蒙蔽自己的想法是可笑的。事實上我的革命情感只是一種小資產階級人道主義的個人英雄主義，只是對舊社會的不滿。我想在革命中尋求個人的名譽與地位。因爲我沒有把自己當作無產階級的一份子，而以第三者的立場來「革命」的。所以，

如上面曾講過的，我腦海的深處還存在着：共產黨到底是「真革命」或是「假革命」的疑念。當時我入伍時根本還沒有下定爲革命而犧牲生命的決心，也沒有想來當一個共產黨員。我沒有想到，也不會情願，來當一個默默無聞的戰士，沒有想到自己可以同普通工農一樣在戰鬥中輕易的死去。我認爲知識份子比工農份子「進步」，工農份子要「靠」知識份子來教育與領導，因爲他們不「懂得」革命的「道理」。我認爲工農份子「不及」知識份子「寶貴」，因爲工農份子多，知識份子少。因之我想，把我這樣的知識份子拿出去當兵，去隨便犧牲，是太「可惜」了。因爲我有「專門知識」呀！我應在革命隊伍中受到尊重與重視，因爲「我是知識份子，我來幫助工農革命的呀！」

這種爬在別人頭上，輕視羣衆的觀點是多麼嚴重！這種妄自尊大，自命不凡；要求別人爲自己犧牲，而認爲理所應該的剝削階級意識；以專門家的資格幫助革命的僱傭觀念；是多麼可笑。

具着這樣的入伍動機，當入伍後，戰鬥時表現思想上怕死；別人並不特別優待尊重我時，表現苦悶；地位降低時，組織問題不能解決時表現氣憤，而在和平環境中表現思想上的腐化，——便不是奇怪的事了。

第三部份——入伍後的思想與工作

入伍後，我想進「兵工廠」（我以爲總有個兵工廠）否則就進抗大學習。當發覺事與願違之後，我也就高興的被分配到一旅服務團，不久便入教導隊學生隊學習。

一入伍，我像進了一個新的世界。一切我都覺得新鮮，好奇，許多傳統與作風都使我高興，欽

佩，快活。特別是對於服務團一些年青的團員，本領都很好，工作又活潑，民主作風好，而幾個領導者（團長、隊長、政指）都年青，有能力。並且兩個是女同志。這些印象都使我把對於共產黨的懷疑一鼓腦兒打消了。我具體的感到了共產黨的偉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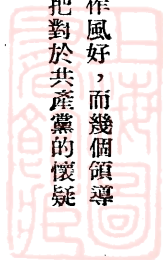
我滿以為到了一個自由民主的新天地，而無所拘束了。就這樣，我的小資產階級的尾巴也就明顯的暴露出來。舉例如下：

1. 絕對平均主義：我看到首長穿皮短衣，內心便覺得奇怪，以為「不大好」。因為我聽說新四軍、八路軍的幹部是與士兵分不出的，服裝飲食都一樣，而且也「應該」如此，人家誤認朱德是個小兵，我以為很有意思，這才是「革命」軍隊中的「優良傳統」。

一次旅首長在我們宿營地走過時，後面跟着一批特務員等人，也覺「不好」。以為「首長」（當時對於「首長」這二字，我也認為不大妥當，似乎不合革命要求）一點沒有「威風架子」，平平常常才是好的。

二、自由主義：對於紀律，我在理論上也認為必要，但自己就怕受紀律約束，我在課堂上覺得教員講得沒有味道時，就自己拿出別的書來看。認為：「強迫聽話有什麼意思呢？我自己看書，倒有些進步。」這是我在校中的慣技。

對於強迫不應講鬼話，我不懂為什麼要強制不說。一次，人說首長的津貼只有五塊錢，我說：「事實上總不止這些，一個月的香煙錢也不夠呀。」當時排長就查問。我想：這又何必認真，這不是「事實」嗎？你為什麼硬不肯客觀些承認事實呢？就是錢多些也無所謂呀。



當排長提到：不要破壞幹部威信時，我認爲「威信」兩字只有國民黨部隊才有，我們爲什麼也要講「威信」呢？幹部好，有本事，大家自然信仰他，何必強迫建立「威信」？

三、自高自大：政指徵求我的意見，說要把隊裏的大學生（四五個）編在一個班里；我完全同意，說：「這樣我們個性相合，程度相同，學習上才有幫助。」實際上認爲與程度低的人在一起對我們的學習無幫助。

看不起排長，以爲他理論差，多「嚙齶」，無資格當我們知識份子的領導人。（對他的指示，意見，看做嚙齶，多嘴）。

四、調和主義，第三者立場，政治上幼稚無知，麻木不仁。對隊裏的青年隊不很同意，認爲他們對羣衆的關係太不密切，對羣衆沒有說服，教育，幫助；只有監視、回報、打擊。以致與羣衆對立起來。（其實那時有兩個托匪，倪與宋，在鼓動羣衆與青年隊，俱樂部對立）。

一次反動搖鬥爭會，（我對於鬥爭會的作用根本不了解），我對於被鬥爭的同志很同情，他原以爲到新四軍來可以寄錢回家養母，來了以後，才知道只有三塊錢的津貼，所以又想回去（我的小資產階級人道主義）。但大家都以動搖，可恥加之；使我引起反感，以爲「過火」，「沒有設身處地爲人着想」（只存在心裏，沒有發表意見）。我想那些發表意見的人，也是爲了出風頭。

第二次是反個人英雄主義大會，（反對托匪倪、宋與俱樂部對立，自出牆報事）；我對於軍隊的組織系統不了解，對倪、宋的政治面目根本沒有懷疑到，所以只以爲他們之自出牆報，是爲了出風頭。這次我發表了意見：我承認他們自己出牆報是包含了小資產階級個人英雄主義的成份的；但我

說，如果他們出的牆報真的對大家的學習有些幫助的話，那末也是可以的。（我拿在上海對於「民主」的了解，學生工作中的經驗搬到部隊裏來）。另一方面，我也指出了青年隊「不對」的地方，便是「不應該」專門「打擊」人家，而不對羣衆進行耐心的說服教育。我並且引用了宋在班裏的意見，「青年隊與國民黨的三青團差不多，也是做特務工作的，專門監視人家，向上級回報」，來證明青年隊給人家的印象太壞，所以青年隊自身也應該負此責任。政指做結論時，嚴格的批評了我的調和主義，說我在美麗的言詞下面替倪、宋辯護。當晚我自己想想，我發表的意見的確是沒有站穩立場，所以對政指的意見我是接受的。

如上面所說的，既然入伍後我便對共產黨的領導感到偉大，正確。但是爲什麼又有自以爲是的不滿意，犯了好些錯誤呢？我已經認爲這是一個真正革命的軍隊，是一個「自由」，「光明」的世界，我在這裏可以毫無拘束，自由思想，自由言論了，於是我便以我的小資產階級的「革命」（？）觀點，自以爲是的測量一切，我的自高自大，自命了不起的壞意識便無形中幫助了我的錯誤。我並沒有懂得自己的幼稚無知，對於新事物，我不是以一個小孩子的態度來學習革命的，而是以一個「有見識」「懂得革命理論」的眼光來「批判」的，我入伍時，正是抱着這一種妄自尊大的態度來的。

就因爲我在隊里表現了對排長的輕視，對革命傳統的對抗，對托匪的調和主義，便造成了我後來被上級懷疑爲托匪的根據之一。

一九四二年二月初，有四個學員（倪、唐、宋和我）被調到大隊部。前三者便是在隊中與俱樂部對抗，自動出牆報的組織者。上級對我們說，是因爲我們這幾人文化程度政治水準比較高，所以可以

一面工作，一面學習。職別是見習政文幹事（其實上級要攷察我們的政治面目）。

不久，旅政治部便開始着手破獲托匪的工作。托匪主要的活動便在旅服務團與旅教導隊。光是教導隊學生隊（男女兩隊）中被托匪誣蔑或牽連到的有××人。

二月二十六日我被上級審問，並且用了些肉罰（綁吊、灌水）沒有結果，隨後送去休養了四五天，拘留監禁廿天左右，在三月二十二日恢復自由，仍回教導隊學習。

這一次被誤會的事情，的確對我後來工作學習中的表現有很大影響：我對於好些幹部同志，一直不敢絕對地信任，認為只要他們犯了一些主觀主義，我又可能重被誤會，而我的組織問題之長久未能解決，使我懷疑組織至今對我的政治面目有懷疑。因之便以為表現好壞是不會有什麼作用的，只有組織上對我過去歷史有了清楚的了解之後，才可能打破對我的懷疑，但我又覺自己在家的歷史特別是參加復興社而又脫離關係的事更難有人證明，所以我的政治面目要使組織弄明白也是困難的。

由於對組織工作者的不敢絕對的信任，對組織懷疑的原故，表現在工作中更加胆小，對人採自由主義，明哲保身，但求無過的態度，對黨氣憤，（因黨藉問題受刺激時），對思想問題閉口不談，以致影響了自己兩年來思想上的不進步（當然不是唯一原因）。

一九四二年六月——一九四四年二月教導隊畢業後留下教育機關工作，這其間經過部隊合併編隊及幾次工作的調動，我的思想和工作表現如下：

一、開始留下教育機關做文教工作時頗表不滿，以為上級把我留下是不信任我，又覺得自己工作的地位很低，一部分幹部和雜務人員瞧不起自己，把我青年隊的生活編在雜務人員一起，每次參加開

會覺得很不自在，這似乎對我的精神上一個侮辱，覺得非常苦悶，大大刺激了我的愛面子的心理。

這時我覺得軍隊生活不合自己的「個性」，以爲軍隊裏沒特長及限制個性的發展。缺少感情，生活枯燥，使個性退化，感覺遲鈍。當黨中央提出二年打敗日本的口號之後，我曾寄信給我的繼母，告訴她好好保存我過去的書籍和儀器，打算二年後一定脫離軍隊回家再讀書，將來做個工程師爲新民主主義服務。

二、在教導隊開學時就調任團部文化幹事（相等於文化主任教員），以爲自己的地位提高了，工作較繁重忙碌，一些幹部如副官等也以另眼相看，甚至叫我文化股長，這是喜形於色大有「非我行」之勢，充分暴露了我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與僱傭觀點。

三、教導隊與九分校合併後，改任爲營部政文幹事，似乎降了一級，心裏老大不高興，這時最嚴重的是犯了工作上官僚主義毛病，工作怕困難與怕碰釘子，不敢深入下層，怕接近學員，時時總以爲自己的伍齡短，工作經驗差，又是非黨員，怕別人瞧不起，所以不敢到資格比自己老的連隊教員那裏检查工作，即使從連隊中反映了些問題，除回報給主任教員外，自己不想辦法解決也無法解決，因此最後對工作失去信心而不安心起來，這些都是愛面子，怕出醜的思想在作怪，也是工作上缺乏毅力所致。

四、重新編隊後我調到連隊當文教，克服了一些官僚主義及輕視羣衆觀點，在接近學員中逐漸地體驗到工農同志的純潔，坦白，想把自己的情感溶化在大衆的感情裏面，這時期工作上主要是鬧本位主義，自己的功課抓得很緊，因此不得不侵犯軍政自修時間，同時除了教育本位的工作外，其他俱樂部

部等工作就馬虎不負責了。

在這個時期中，因自己的組織問題長期不得解決，填了一次入黨志願表未見批准，對組織很懷疑不滿，認為黨故意在試探我，內心覺得無限的苦悶與不安，我又常想起了自己個人的前途，拿「將來我總要脫離軍隊去做技術工作」來安慰自己，我為什麼要急於入黨呢？一方面是爲了求得個人的更快進步，達到理想與實踐的一致，另一方面懷了極濃厚的虛榮心與地位觀點，以爲非黨員是可恥的，入黨後個人前途才有着落。

在去年自我鑑定中我開始第一次認識了自己個人主義的立場，開始懂得如何從思想上來檢討自己，但對自己具體的主要的思想上的毛病還是茫無所知，反省時不夠大膽坦白，因之沒有澈底解除自己的苦悶，這次幹部輪訓集中整風，才深刻地了解自己的思想全貌，也使我從苦悶中解放出來。

總結我入伍以後所表現的主觀主義的思想方法與個人主義的思想意識，大約如下：

甲、思想方法由於自己一直在學校裏啃書本，從未參加過社會生產活動，毫無社會實踐的經驗，由於自己已受過十多年的資產階級的學校教育，一貫地接受了形而上學的思想方法；由於自己對馬列主義學習的一貫教條主義的態度，從不聯系實際；而當在實際的工作中碰了釘子，也不知去研究其理由，從來就對困難畏縮，不願去碰去鑽；因此我的主觀主義是佔了絕對的統治地位。

1. 表現對於政治、軍事問題認識的誇大片面，迷於現象上。初入伍時，對敵後鬥爭信心不高，清剿、掃蕩時，聽到敵人如何如何，便覺得對反清剿反掃蕩的勝利信心少。蘇南戰鬥時，開始時一味樂觀，甚至以爲我們九分校只担任次要防務，不會拉到前面去拚的。等到我們突圍出來，便認爲我們這

次是「失敗」的，却認爲劉政委當晚報告「我們的勝利」只是「鼓動工作」。在這次蘇南大發展之前，一直認爲十六旅的鬥爭前途很「艱苦困難」。

2. 表現於對自己思想意識否認矛盾，抹煞矛盾。把自己思想上壞意識的隱現，認爲是偶然的，可恥的，不值得追究。自以爲思想上已懂得革命道理，不會有什麼大毛病。因之，自己不願看見自己的錯誤思想，不作有意識的自我鬥爭。在實際中碰了釘子後，只以爲自己經驗少，能力差，個性天生或把責任推倒客觀環境或別人身上。以爲只要自己伍齡長了，理論書多看些，經驗多了，就會進步了。

3. 表現於工作上不理解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一個碰釘子的過程，一個認識的過程。初入伍時，我甚至想在某一教育機關中先學會一套所謂「實際工作的辦法」，來到處順利的工作。誇大困難，因之胆小，畏縮，不願意碰與鑽。勝則驕敗則餒，希望一下子就把工作攪好，要末就不做，不懂得工作中的曲折性。

4. 表現於待人接物上，對人喜歡下結論，是進步的或落後的，單純片面的了解別人；如對上級幹部不希望聽到他們有弱點，否則就失望。對落後羣衆，以爲無法教育，不願意接近，放棄宣傳教育，看到個別幹部的弱點多，連他們的講話，即使是正確的，也以爲他是吹牛，講漂亮話，看不到人家進步的一面。看到別人的一舉手一投足，聽到別人一言一語，甚至一些表情，一些服裝，就輕易下結論。工作上不願請求人幫助，以爲人家一定要不高興，不知人的情感是可以轉變的，是可以用的方式方法引導的，因之表現少接近人，少同人討論問題，待人接物上的千篇一律，不會研究對象。對人

的錯誤與落後，採自由主義態度，不懂得這些東西可以，而也只有經過鬥爭來克服轉變的。

以上的一些思想方法上的毛病，是產生我的自由主義與宗派主義的主要根源。

拿我對組織懷疑的一點上來，也可證明我的思想方法的可笑；我總希望組織一下子信任我，或者便是組織懷疑我是特工分子。這種絕對的看法，形成我直到輪訓班中，在打通思想時，對於別人的質疑不滿，當作「審問」。而當支委回答我：『對你「的確」是有些懷疑』的時候，我認爲：「黨對我的政治面目至今還不信任。」於是自己悲觀失望起來。

乙、個人主義的思想意識。我的錯誤的思想意識，主要表现在個人英雄主義上面。自幼我便想向上爬，出人頭地，不同凡人，自命不凡。我思想之轉變主要也基於個人英雄的人道主義觀點，我的入伍時的「幫助工農革命」的俠士氣概都是與我的個人英雄主義分不開的。自高自大，虛榮心，愛面子，地位觀念便是這個個人英雄主義的幾個主要方面。其次則是小資產階級的自私自利，個人打算，及由於小資產階級的情感所產生的宗派主義。舉例如下：

1. 自高自大，自命不凡表现在對於自己的出身以爲高人一頭，以爲文化程度高有辦法。自以爲很革命，很進步；思想上沒有什麼大缺點，生活緊張，學習努力，工作積極。認爲組織上不要我，應該怪組織的關門主義，是組織對我不信任，而我自己呢，則早已具備入黨的條件了。看見落後的羣衆則表示輕視不願接近，表示潔身自好，自命清高，對別人的弱點則背後談話，或是當面嘲笑。

自高自大的意識，逐漸在同實際人事的接觸中減弱着。

2. 愛面子，虛榮心。表现在怕暴露自己的弱點，對人不坦白。儘量掩飾自己的弱點，顯露自己的

優點。自我批評是有的，但不敢挖到思想的深處，自己欺騙自己；因此也沒有改正的決心。對於自己的弱點，認爲自己知道就好了，何必告訴別人？也徵求別人的批評，表面上表示自己虛心，希望別人多說優點少講弱點。對別人的弱點，要看對象來批評，怕人反唇相譏，丟了面子。

好勝心，總想強過別人，看到比自己強的人則表嫉忌，看到人家比自己弱則表慶幸。

自己是非黨員，怕別人看輕、嘲笑、因之少談思想問題，——投鼠忌器。

怕同人爭吵起來，面紅耳赤不好看，怕給人以壞印象，只望和平相處，對人都無原則的讓步，調和，甚至影響工作，心裏則表示寬大，無意氣，不頑固以博人好感。

工作中怕碰釘子，怕做錯事情，心中只想一鳴驚人，馬到成功。

愛面子，虛榮心，自尊心的意識在我是極濃厚，只在這次整風中，才第一次打破了這一堡壘，使自己在思想上認識了自己。我的對人對己所採取的自由主義的態度其基本思想根源便是愛面子。是我個人進步上最大的敵人。今後是要下決心來作長期鬥爭的。

3. 地位觀念，表現在不願埋沒自己，強調個性，想做個工程師。這個職業，在我認爲是高尚的，受人尊重的。對軍政幹部重視，對軍隊技術工作，雜務工作，與文化教育教育工作輕視。調動工作時，地位高了則喜，低了則氣。

當別人重視我，優待我，我的工作情緒高。當別人輕視我，不顧我，我的情緒低。

平時則常常要考慮自己的前途，自己將來的地位，組織問題不解決感到苦悶，因爲非黨員的工作是沒什麼「地位」的。（？）

但自入伍後，在實際工作中逐漸體會到自己工作能力弱，經驗少，黨性不強沒有資格負擔大的工作，而在接近羣衆的過程中，自己的感情漸有轉變，覺得地位高低之無聊。（當然也只是略有一削弱）而已。）整風中，對地位觀念有很大轉變。

4. 自私自利，個人打算。

首先表現在思想上的軟弱，由我入伍動機中可以看出來，我入伍時是想來「幫助」革命，做些工作。却沒有想到準備犧牲生命。所以入伍後，在我個人生命受到威脅時，思想上便表現了怕死。可是由於沒有受到嚴重的考驗，這個怕死的念頭，並沒有暴露出來。蘇南戰鬥中，送茶上童山，目睹敵佔對山，有進攻童山模樣，營首長下令戰鬥準備，當時我神經經歷到從來未有的緊張——怕死。當晚送傷員上後方醫院，路上情況不明，我估計可能被俘，我考慮到被俘後，可能受不住酷刑而屈服，但從教導員死後，我對「死」的敏感度少了。我感覺自己的可恥和無聊，我覺得像教導員這樣的人材，在革命中貢獻大，有前途，而竟犧牲了，好些優秀的幹部也犧牲了，我疑惑自己活下來是不是可貴？對政治上的堅定性有待今後在實際鬥爭中的鍛鍊考驗。

其次，在思想上我曾長期受過「人不爲己是傻瓜」這句話的蒙蔽。在上海家人就說我不懂得「欺騙」，「花頭」，是「傻」。入伍後，當別人表示「自私自利」時，我就常不甘「落後」，也要自私一下，否則似乎太「傻」了。我也感到「自私自利」與共產主義是不相容的，可是我還常時爲個人前途打算，爲地位打算，甚至計較睡覺地方，吃菜多少，（入伍初期尤嚴重）。在工作中不做「吃力不討好」的事，有時怕麻煩，貪舒服。工作本位主義，只照顧到自己主要的工作，對別人工作的關心幫

助少。學習上不自動的接近人，在思想上幫助人差，缺乏同志間友愛的革命的情感，對別人的進步與落後不關心，甚至看見比自己差的人幸災樂禍。思想上存在着「明哲保身，但求無過」的個人打算。

再次，我前由於認識的錯誤，一直以爲什麼人都「有」個人主義，這使我模糊了對自己思想意識落後的嚴重性，放棄了自我鬥爭。這也是我不進步的一個原因。以致認爲「有些個人主義，又有什麼大關係？」

5. 宗派主義，從個人英雄主義與小資產階級的私人情感出發，產生了我比較濃厚的宗派主義。這首先表現於依照個人的情緒，愛好來接近某些同志或不願接近另一些同志。對同級以情投意合爲標準，合此標準：便視爲知心朋友，如遇個性不合，則看見了不舒服，甚至工作上應商討的，也放棄了，應合作的也少合作了。對羣衆則以順眼否，可親否爲標準，合此標準，便能接近，開開玩笑，否則退避三舍。

丙、目前尚存在的缺點：

1. 由於自己思想方法上存在的弱點，及對過去經歷的某些部分的模糊，使自己在反省中常有片面誇大，分不清主要與次要，以及分析中的似是而非的感覺，特別是在局部反省中比較嚴重。這表現了自己的理論水平的低弱。

2. 自己所反省出來的錯誤的思想意識，雖然受到了嚴重的打擊，與一部分克服，但在整風過程，仍在不斷地流露出來，如自高自大，嫉忌心，愛面子，少接近人，個人主義學習，自由主義都有。

丁、今後努力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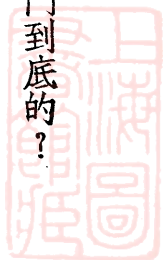
1. 加強理論上的學習，掌握思想武器。糾正過去好高騖遠，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的學習。多研究整風文件及其參考材料，必需深刻反省，連系自己的思想與工作，提高對革命的認識，提高對自己的認識。

2. 在實際鍛鍊中，面向實際。從實際中學習正確的思想方法，從鍛鍊中改造自己的錯誤的思想方法，不怕碰釘子，拿起自我批評的武器，不愛面子。從實際中學習羣衆的革命情感，把自己小資產階級的情感轉化爲大衆的，真正革命的情感。

我是怎樣從敵視共產主義轉變願為共產主義奮鬥到底的？

我祖籍本江蘇宿遷，1920本人生於淮陰，三歲生母即去世，父又不常在家，幹軍務在外。由此小時即在繼母姜氏下過着被虐待的痛苦生活。家僅靠佃給農夫三十餘畝田作為生計；在十二三年中僅上了兩三年私塾學校，生活上待遇上的窘困和痛苦可想而知了。父1933年春返里，見此情不忍，將我帶去隨軍讀書，於淮陰及如皋石莊；於石莊時另一晚母許氏，雖無子女，但對北方忠厚孩子亦不順眼；且又因隨軍流動性大，於同年冬，即寄居石莊父之一營商契友施姓家，繼續求學。

十數年的家庭學校生活，由於父親不戀家，獨自在外，一切皆為名為利，升官發財的享樂思想，再加上親戚皆較我家有錢有勢，從小即失母，遭晚母虐待，使自己不戀家鄉，為着個人自由生活着想，由此養成深深的自私自利，升官發財，圖名求利的享樂主義的人生觀。由於家鄉的偏僻，家庭生活遭冷眼，經濟上從小不給錢用，管教極嚴，很少與人相處，養成了孤獨習氣，使我狹隘胸襟不寬，無遠大的氣魄；同樣對晚母的忍辱求全，不思反抗，使我遇事妥協，調和、缺乏鬥爭意志。脫離了勞動的資產階級教育的學生生活，更由於多接近了古舊的俠義小說，在政治上受了三民主義的薰染，崇拜英雄偶像，自己也想能成爲一個英雄，使我輕視勞動，養成脫離實際的唯心觀念，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又由於在學校學業的優良，蒙教師誇獎，同學敬仰，使自己自命不凡，喜出人頭地，好表現自己，喜人奉承抬舉，愛出風頭，對落後的看不起，對好的則妒忌排擠。在施姓家四年，因其經商求



利，故種種剝削法門，商人的虛偽滑頭，看人見勢說話，順風轉舵的賺錢，對人的方法，亦對我影響不少。但在另一面，資產階級的民族教育，對我民族意識啓發，也起了作用的；從小失母的痛苦生活，使我對家庭無所依戀；小資產階級的沒落生活，對勞動大眾是同情的。

偉大的抗日戰爭，驚動了中國每一個角落，靠近徐州的宿遷，更顯得動蕩不定，33年春即又轉往如皋求學，不久如城淪陷，鄉間游擊隊興起，由於自己學業無法繼續，需另求出路；民族意識的激發；因而經施姓家介紹，而參加了保安四旅何克謙的人民自衛總隊了。開始也不過當個壹等兵，後又升下中士班長，就這樣幹了九個月，又調泰州受訓，由於結果品學優良，被同排中隊長區隊長所賞識，介紹往八十九軍任少尉排長，但終非土生土長，關係不投，又轉至四旅八團任少中尉排長。34年秋，又被保一旅送東台軍校受訓，後初任原職，不久升上尉連長，保四旅黃橋戰敗後，經郭心冬張撰義介紹至八十九軍部任上尉副官。後在決戰中被俘至本軍，兩年多的友軍生活過程就是這樣。

在這樣一個部隊裏，當然是貫徹着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法西斯精神和教育的，（雖然他從沒有公開講過是法西斯的宣傳，但內容總還是這樣）他們所標榜的，當然是「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中心教育就是三民主義，講的一套就是「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是唯一的適合中國國情的，民族主義在求中國之國際地位平等，……」，「蔣委員長是中國的抗戰領袖」，當聽到委員長總裁的時候，坐下的人要肅然正坐，立住的人要「踢禿」兩腳靠攏的，時常頌揚他在二三年來的豐功偉績，他攘外必先安內的高妙政策（？）十年剿共的勝利（？）新生活運動的偉大保甲制度的正確（？）這許多多的東西，在我當時都信以為真，確信無疑的。尤其在東台的訓練，這方面的麻醉教育那更深

了。從韓德勤自渝返蘇後，關於整軍措施，在組織思想上的統治，更趨積極，於是在三四月間，在何旅又集體參加了國民黨。當時我的認識就是認爲：一、國民黨是全國大政黨，有資格參加，那是偉大的，無限光榮的，可以出出風頭，二、由此更可使上級信任重用，地位也更鞏固，別人也無法輕視與排擠。後來由於國民黨組織鬆懈、混亂、腐敗，因此也談不上什麼組織生活，和組織關係的，從此國民黨更公開進行反共教育，用精神講話的名堂出現，講「新四軍掛抗戰招牌，藉口組織各種抗會，從中發展共產黨的組織」，「新四軍不服從中央命令，攻擊國軍擴充地盤」，「共產主義始終不能實現，不合乎中國國情的，……」許許多的鬼話，把我軍講成匪軍，用「抗戰」做幌子，說不消滅匪軍，我們不能抗戰。在那時候，我們總以爲這些道理對的，再加上平時「軍人以服從爲天職，要絕對服從」，「革命軍人要爲三民主義奮鬥到底」？那時我們的確無二話可講。在黃橋戰鬥前後，我就接連參加四五次戰鬥，在戰鬥中自己雖無高度犧牲決心，但思想上總認爲萬一犧牲了，這是爲國家，爲三民主義，這是光榮的啊。有不成功便成仁的打算。戰鬥一來，當然總想打勝仗，多殲滅一些新四軍爲快，尤其保四旅戰敗，調八九軍當副官，對戰鬥的熱心與忠誠更是發揮了的，待決戰失利時自己一心還想安全突圍之計，結果不得已被俘，內心實忍恥怨恨之極。兩年多的友軍生活，在國民黨的武斷麻醉教育下，使我堅信了三民主義與國民黨及蔣介石，而反對和懷疑我黨我軍，種下了極反動的思想。在意識上更助長發展了個人主義，升官發財，享樂主義的人生觀；養成僱傭觀念；想地位，想上爬；想生活美滿舒服，養成感情拉攏，物質團結，討好上級，求平級輿論良好的想法；養成了高高在上，站在羣衆之上，發號施令的軍閥官僚習氣，薰染上一些拍上欺下，拉平級、排擠、嫉忌、

拉攏，幸災樂禍等等剝削階級意識；求威風、愛面子，總言之，惡劣的非無產階級意識加深與發展了。

被俘後即由部隊解送海安、安豐、沿途老百姓熱熱烘烘嘲笑不已，行動上又受限制，前日浩浩蕩蕩，耀武揚威，而今左解右押，低頭無言矣。當街上老百姓朝我笑嘻嘻時，實忍不下，破口相罵：「待老子將來有了辦法，連你的房子都給你燒光」！不久，被俘的人全部集中，由我軍同志講話，「現在徵求大家的意見，願意在本軍工作的，出來站在東邊，不願幹的回家的，站在西邊」！這個時候，我是巴不得能走，可是又怕，恐怕把「要回家」提出來以後沒有好結果，後來總未敢出。當時亦看見好些人願意工作的出來，我心想：「你們這班傢伙還有什麼革命的氣節，配什麼資格當個中央軍官」！恨之入骨。當一次要調一山砲連長出去時，我講：「你知道你究竟是什麼人啊！開砲的時候，不要瞞住自己人打啊」！他的回答也是「我知道」！在此過程中，韓德勤亦常有人暗中聯絡，給路線，對被俘者引誘逃回，我知道了，在這當中是盡力慫恿他們的；但自己呢，也想逃走，奈父親數年未通信，回家亦無出路，回八十九軍吧，又無得上級，部隊又垮了，職位還成問題，被迫無法。又正好在安豐，怕再跑路，自己獲得一些自由，一面對本軍戰術，又抱新奇心理，因此半自願的，進入了蘇北幹校而入伍了。

雖然進了幹校，但在政治認識，總還是敵對的。經常暗地胡鬧一場，以出心中之恨，而引以為快；當皖變發生的時候，我聽到了，感到無限的快慰，認為這下子可出氣了，給黃橋戰鬥報了一個大仇。聽到三十萬大軍東進，心想打得來好，對我們一切宣傳，總認為吹牛皮的，當政指說：國民黨政

治指導員就是特務工作的時候，我說你們政治工作者專門聽下面的話，會報給你，這才是標本的特務工作呢？當門爭一個學員說是特工時，我開始就認爲這還不是殺雞嚇羊的一套把戲。常討論時事中，說國民黨蔣介石的投降妥協性時，許多人同意這個意見，我想像你們這樣怎麼能服從中央？經常找一些難題，去爲難教員和學習組長，如「天生萬物不同，既不同，焉有平等之理？人爲不平等，可謂天生不平等（聖賢愚勞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如何能平等呢？」「共產主義取消國家政府法律，那麼誰來組織，召集會議，糞桶誰肯去倒呢？有人不盡其所能，怎麼辦呢？」在對人事關係上，看見幹部不扣風紀扣，不打綁腿，歪帶帽，禮都行不好，心想怎能打勝仗的，這樣像個軍人真天曉得，尤其制式教練，指揮死板，口令都不會喊，動作笑話百出，更爲我所歧視。對工農同志，以爲太髒了，又不肯講話，見面總遠而避之。經常當他們而故意講些鬼話，發發牢騷，讓他們會報，除此而外，則我們友軍齊來的，總成天攪在一起，談論是非。

四一年的十月結束了學習生活，初走上了工作崗位，與友軍來的一輩人離開了，又由於反掃蕩及工作熱情，而使敵對意識言論趨於沉寂，待至四二年二月，進駐花家倉時，又碰到對我軍敵對的沈氏兄弟，潛在意識又露。沈氏兄弟，一是在東台訓練過的，一是國民黨的小學校長，一在資產階級學校中已讀至高二，由於過去資產階級武斷的教育，對我軍減租不滿，當然與我亦意氣相投了，同年四月又進駐通師，（在思想上統治在資產階級復古的與三民主義宣傳下的，與我敵對的一個學校），經沈氏一兄弟的介紹，得識高師數同學，在談論中，他們了解了我是原國民黨軍官，於東台學校受過訓，了解我的心情，因而甚投，毫無忌憚，無話不談，如「二五減租不對，共產主義在中國是個病態主

義，共產黨的牆報上沒有一塊沒有紅的，共產黨無非是企圖赤化人民，青年……」。如此我不但不加解釋，且和聲相應，於是有了合組戰地參觀團，齊往大後方之議。思想上開始了第一次的動搖，不久校部下令調師部巡視團，我以為上級怕我有什麼政治問題了。大概又騙我去學習吧？於是將有的書籍盡寄沈氏兄弟家，以作將來往中央軍之用。就在離開那天的十幾里路程中，展開了走與不走的鬥爭。結果，還是跟住往二旅巡視去了。在此過程中，又與一同志爭執數次，想到了自己生活的艱苦，與地位低，加上政治上的敵對懷疑，因此正式開始提出請長假的要求了。後來在負責同志解釋下說：「要回去，待兩三個月以後再說，待二旅部隊變動了，否則會洩露軍事秘密的」。這樣，我又害怕起來，結果未成。待回原部後，由軍幹工作調當軍事助教，地位高了一點，經濟待遇又較好一些，因而又穩定下來。十月又調至學生隊任軍事幹事，地位低了，思想上又開始了第二次動搖。認為既升我為助教，為何又降為幹事呢？總之友軍來的幹部，不會重用，因此又藉口經濟困難，轉而用請短假面目出現，準備一去不返，結果總還是領導者的有辦法，摸著了我的毛病，增加津貼，先發了新衣服，談話中指出了回家洩露軍事秘密的嚴重性，結果還是中止，又安定下來了。在這當中，與同志間的關係上，對我黨的政策及宣傳，則是亂爭論抬槓子，反動思想一直沒有克服，且充分流露了僱傭觀念。一直至四三年的蘇南反頑戰鬥中，我始終還抱着中立觀戰態度，對上級由於分配任務中置我於不理，我是抱著懷疑態度的，對黨的報紙宣傳，也仍然抱不信任的態度，同志間仍然抬槓，就這樣由於受國民黨的麻醉教育，在黨的兩三年的教育下，始終沒有變。在兩三年中，就為了地位待遇，引起自己數度的動搖。唉！的確我升官發財，享樂觀念的個人主義人生觀的劣根太深了，雖然有時工作也負責，好像也

很熱情，可是我從來沒有認識到這是爲黨工作的，而是建築在表現個人的基礎上的。

一九四三，才是我進步的開始，但上半年在人事問題上仍然和組織上連隊代表政指攪不好，和教員室黨員對立，對自由主義濃厚的非黨員則和和氣氣，談笑終日，到六月初開始到路東大通鎮，華中局及軍部幾位首長，相繼幾個大報告，才算我正式轉變的開始，尤其陳軍長饒政委關於國際形勢的報告，使我認識世界的前途和中日的前途，陳軍長彭師長的關於國共問題，及四師的生長的報告，使我真正認識本軍的偉大，一方面更堅定了我抗戰的意念，一方面初步啓發了我爲共產主義奮鬥的思想。接着是七月陝甘甯邊區國民黨進攻的事件發生，當然很明白的，正當國際形勢勝利在望，中國抗戰勝利不遠的時候，國民黨不顧國家民族利益，想乘共產國際解散，用閃擊戰來消滅共產黨，這樣行爲是不對的而且的確共產黨在敵後堅持，與敵僞糾纏，又是事實，再加上中共中央的對國民黨反動陰謀的公開揭露，指出蔣介石實行法西斯，違背孫中山真三民主義的時候，在我腦子的一些被麻痺欺騙的東西，是完全顛覆了，八月中旬閱讀了烈士傳，更認識國民黨過去的毒辣，而對我黨英勇犧牲的同志、內心裏引起大的同情。十月在龍崗的反「大斗進小斗出」的農民鬥爭中，也暴露了封建勢力的額外剝削，我從這當中才真正體會了階級立場。十一月路東銅城破獲了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組織，且由他們自己進行了坦白大會，他們自己招認了，如何進行破壞抗戰的活動，而結果我政府又執行了寬大政策，你說這怎麼不使我更相信與崇敬呢？到四四年初的擁政愛民的宣誓，那也真誠地感動了我的，事實告訴了我，我軍我黨是熱愛百姓的。除此而外，在內隊工作過程中，同志同學對我從未另眼看待，並盡力幫助，這也推動我進步。總言之，我從四三年的下半年，就逐漸地這樣進步起來了。再經

過了這次整風，我清算了自己，在黨偉大政策下，我對共產主義的信念，和我爲共產主義的事業奮鬥的決心是確立了。



我向黨坦白內心鬥爭的過程

我是一九二九參加黨的。原在上海做祕密黨的工作，因叛徒告密，兄弟兩人一同被捕；開始押在上海特別區，不久解送到華界公安局，在不斷的嚴刑拷打與父母哭勸下，再加以過去一同工作的叛徒份子的引誘包圍，堅持到最後第五個月，我終於動搖，向反動派作了自首手續，並帶捕房捉了我們黨的工作者××同志。這種無恥的自首，與破壞黨的嚴重的罪惡行爲，使我出獄後，雖不願脫離黨或再做破壞黨的行爲，但也不敢再主動的去找黨的關係。一直到上海戰事爆發，我回到家鄉組織游擊隊以後×年×月我參加本軍，並於×××年我得××同志的介紹，我才重新走到黨的懷抱。在這抗戰六年多的過程中，直到九分校整風學習，黨風開始，我雖幾次在小組會與大組會上報告了我的被捕經過，當時只承認我的自首是被動的，由我哥哥李×代我簽字，事先我並不曉得，更沒有說出我破壞黨的事實。在黨風學習將結束，作全面思想反省時，師長作了坦白運動與寬大政策報告後，及支部在鑑定前給我的鼓勵，我最後才全部說出自首與破壞過黨的經過事實。過去一貫不說，及黨風開始我說而不澈底，以至最後全部說出，我的內心鬥爭過程，大體可劃分爲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被捕後一直到整風學習開始，我對被捕的這一段歷史採取隱而不露的態度，過去在工作中填表及幹部審查鑑定時，我只是說明我因被捕失去關係，詳細被捕經過，我總是強調我在法庭好的一面，如開始給我上電刑，能如何的堅定不移，有爲黨犧牲的決心；但後一段自首與破壞黨的行



爲，採取堅決不說的辦法，爲什麼不說？當時我的顧慮是：

A、我覺得錯誤太嚴重了；如全部說出，不僅現在的黨籍與現在的工作不能保持，生命是否有危險，還是問題；這給我最大的顧慮，也是一貫不說出最主要的原因。

B、我也曉得在整風學習過程中所說出的任何錯誤，都可不受紀律處分，不過即使真的不受處分；但，今後組織上再分配我的工作時，一定要考慮我，或不信任我。

C、我被捕自首與破壞過黨，也許今天組織不曉得；只要能堅持到底，再能找到一兩個當時一同工作的同志給我證明一下，或者有可能恢復我的過去一段十多年光榮的鬥爭歷史。這種僥倖與對黨隱瞞的心理，一直到我全部說出被捕的經過前五分鐘，我還在想，而且也真的寫過信到路東給一個過去和我一起做黨的工作的同志，要他給我證明。

第二個時期，黨風開始，小組會輪到我報告，不說，但是我又考慮到「不說是否行？」支部又幾次的動員說：「有幾個同志過去錯誤的事實，我們支部已有充份的材料，至今他本人尙未說出，我們仍希望他能自覺的向黨坦白。」這說明了好像對我個人說的，同時我又考慮到我自首曾經登過報紙，（時事新報，國民日報）也許組織上曉得一部份，如仍堅持，最後整風結束組織鑑定說我不坦白，或者要我留學，這是多麼可恥。爲了能很好通過關節，採取避重求輕的辦法，在團長號召打通思想時，我會個別的向團長說出我過去被捕自首過，但我又連忙的再三說明，我的自首是由我哥哥代辦手續的，事先我並不曉得。爲什麼這樣的說謊？據我當時的估計，組織上即是曉得一部份材料，頂多在報紙上見到我的自首書，因此我推賴這個自首的手續是別人（李×）代辦的，我自己自首是被動的，責

任可以減輕些；關於我自首後，帶捕房捉過我們工作同志這一段事實，我估計到組織上是絕對不會曉得，所以我仍堅持不說。在小組與大組會的幾次報告，我都再三的警惕着自己不要說通了風，引起別人質疑，所以說話很小心，事先起好「腹稿」，強調我在法庭好的一面，說明我是如何的堅定不移。

第三個時期我的錯誤全盤托出，原因是：

一、客觀上給我的影響；

A、在小組會與大組會兩次的報告後，支部給了我的安慰與鼓勵，更誠懇的在大組發揚了我的「坦白」，因此對我所保留的一點，更感覺到不安。「坦白」這兩個字，好像在向我發笑，也深深的刺痛了我的心。

B、小組會一面是鼓勵我的坦白，一面不斷的在問：首是否有代簽名的可能？與自首及「在上海當時的環境，反動派是否輕易的放過機會，不要你做一些破壞黨的工作？」在一個同志這樣的提出問題後我心裏刀刺一樣的刺痛，面紅耳赤，支吾雜言，以致惱羞成怒，擺起面孔毫不誠意的說：「假使不相信我，到上海去調查好了，我有什麼辦法呢？」但爭論過後，我又考慮到問題的嚴重，絕不是硬幹能解決，究竟我還是硬幹呢？還是全部說出呢？

C、在將結束前十多天，師長給我們作了寬大政策報告，說：「我代表區黨委絕對的負責，向同志們號召，在整風過程中說出的任何問題，不受任何處罰，相反的黨會更信任這個同志。」「首長報告後，當場××同志是日本特務機關派來，長期埋伏做破壞工作的，他首先響應首長的號召，全部說出他在日本特務機關受訓的經過，及派到我們部隊所做破壞黨的事實經過，繼續接一連二的好多同志

都坦白的說出自己過去的錯誤，這給我很大的啓發！」我覺得長期埋伏的特工都能坦白的說出，我的錯又有什麼不能說呢？」

二、經過我主觀上的自我內心鬥爭。

A、對個人前途的考慮應該向那一條路走？國民黨的腐敗和抗日民主的力量一天天的生長，及整個世界反法西斯形勢的好轉，資本主義逐漸趨向倒台，共產主義一天天的接近勝利，我願意爲追求真理走向光明大道。

B、要做一個共產黨員，對黨坦白是起碼的條件。像我這樣對黨隱瞞，不忠誠的罪惡行爲根本不配稱爲一個共產黨員，那麼將怎樣辦呢？要做一個終身的共產黨員，第一步就是全盤忠實托出我被捕後及對黨破壞的行爲，也只有這樣，我才能解脫煩悶；所以在黨訓練將結束的前兩天鑑定的時候，我最後粉碎了這個堡壘，走向了黨的懷抱，「思想鬥爭是最殘酷的，但坦白後又是一件最愉快的事，」現在我才深深的體味到。

我的內心鬥爭過程



我在前方是犯過最大的毛病，貪污了21,630元，亦鬧過幾次不正確戀愛，發展到企圖脫離革命，動搖逃跑。

茲把錯誤經過轉變過程簡述於下：

入伍後當經濟幹事，用了二十元錢，認爲這沒有什麼。

1941做敵僞工作，在回來時算賬多報了十元，以爲這沒有什麼了不起。

後來二次出差，又多報了錢，以爲上級沒有辦法查。

1941.12上級叫我買鉛字，又措了180元油，我當時還是認爲無所謂，祇要工作表現積極就好了。

由於工作的開展，飽暖思淫慾，與姨表妹發生了戀愛後，約她在二年後結婚，但後來斷絕了。

後來又追求了一個女性，而且想發生肉體關係，後爲她拒絕了，這個戀愛關係是報告過組織的。

1941組織要買軍火，我滿口答應，由於自己的貪污思想，剛巧碰到軍火商人販穀子，送我五千元，我當時猶豫了，因爲紀律條令上500元要殺頭，但後來又想有錢不拿是傻子，我下次不拿就好了。

正由於如此，思想上起了幾個變化：1.怕死，要求上級派一個通訊員押軍火船，因爲給鬼子查到他可代死；2.生活上享樂，後來又追求一個女同學發生戀愛，被服用具都奢侈起來了；3.注意力集中

於做軍火工作了，其他工作不想了。

軍火繼續的過來，貪污的機會又來了，但是「下次不發洋財」的觀念壓制不下去了，「橫是橫，拆牛棚」，過去貪污過再不貪污做什麼，於是第一次貪污13000元，第二次12000元，第四次2000元。如果我的事件被發覺，我就開小差，「人生在世名利而已。」但是我不願脫離革命。同時還想掩護自己，在向上級回報時，誇大自己優點，把不好的也講好的，這樣可以更好向上爬。對上級態度至少對我好惡來決定的，祇認個人；對下級採取壓制，感情拉攏，金錢收買等辦法，養成他們的僱傭觀點，生活上要求享樂，一年四季衣服各有不同，這時間二個女性鬧着三角戀愛。

1943精兵簡政，所有精簡人員都從我處經過，當時有一女同志，我看她很漂亮，於是跟他發生戀愛，繼之肉體關係；後來把她帶回××，在××那裏的三個女的看到我如此，（當時我不要她們，於是說我：「玩弄女性」，那時我的威信都喪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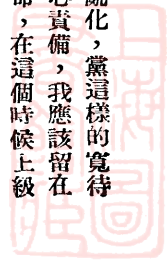
1943，崇明開始清鄉，我因不能立足回到蘇北；當時我對清鄉失去信心，害怕殘酷鬥爭，企圖在平靜地方打埋伏，躲避清鄉，於是向組織領了二萬多元錢，以備費用。

後來由於環境關係，連武器都不要了，隻身到上海躲避，以爲過了一個時期再說，三個月過去了，錢已用完，到浦東去做家庭教師，於是想回蘇北，但是害怕殺頭，因爲工作既回報不出來，錢都用完了，工作垮台了，其他地區亦不能去了。於是動搖了，想做一個老百姓。但又想這不可能，新四軍要捉，敵人亦要來捕我，我不能當老百姓，祇好到偽軍那裏去找出路，但是又不行：1. 那時沒有人拉我；2. 我到敵偽那裏去做什麼事呢？敵偽官亦要有本領才行；3. 敵偽不相信我怎麼辦呢？我又沒有

秘密可以告訴他們；4. 又想到組織培養教育我，使我今天有這樣地位，經濟給我亂化，黨這樣的寬待我，重用我，我怎麼能忘恩負義，以怨報德呢？開始自己內心懺悔了，我受了良心責備，我應該留在革命營壘替黨效勞；在個人報恩主義的思想下拖住了自己，使我最後沒有脫離革命，在這個時候上級打了一個電報要我回去，因此就重回旅部。

回蘇北，對自己錯誤絕對不敢講出來，只希望在組織寬大不發覺中自己再出發爲黨工作，從工作中修正自己。所以組織找我談話時，我絕口不講，只輕描淡寫的承認了幾個錯誤，滿想立刻出發工作，可是結果大失所望，上級要留下整風，並要給嚴重警告的處分。我在這刺激下，就要求學習，企圖在學習中逃脫組織對我錯誤的追究，或緩和一下，但當上級答應我請求時，我又後悔了；我在弄不清學習方向，追戀過去的自由自在和妻子，以及過不慣艱苦生活等原因下，我又想半途上溜了，可是在：1. 沒有錢無法通過據點；2. 舊社會中不可能有更好出路；3. 敵僞不會對我放鬆，4. 不願把四年的功勞一旦拋棄等考慮下，我終於又留下了。

以後雖然穩定了，然而我還不準備講出自己的錯誤，我想咬緊牙關渡過這一階級。當我苦悶時，我總把自己當作一個落難的英雄，我也想將來至前方再報答吧！十月間在聽副軍長報告中發揚了反不良傾向坦白份子黃××與團報號召坦白時，我有點心動起來，可是我還是懷疑，我想是不是有保證，也許組織玩把戲，騙出事實後，再做結論處決，就是不處決，將來也一定永不超生，因此我就又不想坦白，我不敢以自己生命來換取一個好聽的坦白，整風開始了，組織更大聲疾呼號召坦白，我想到自己就是個最不坦白者，就難過起來，我向自己連口應了三聲。再來作反省筆記時，我想只反省一



點工作方法上的問題就算了，可是許多問題的總根源都是爲了貪污而起，於是我只好敷衍一下，可是想到整風坦白，我又自己取笑自己，寫一點皮毛算得什麼？有時翻開文件讀到劉少奇著的論黨員修養，我就覺得一字一句都像爲我而講，諷刺我不配讀它，於是我就將書一拋，沒有勇氣讀下去了；在平時和大家閒談時，無論怎樣高興，但聽到有人講起貪污墮落時，我就立刻黯然無趣，默默的悶起來。在第一次大鑑定中，我爲了要解除內心苦痛，我就稍爲講一點，想欺騙一下組織和自己，可是結果等於飲鴆止渴，相反引起了我更巨大的苦痛。以後在讀到吳芝圃的反個人主義文件時，我內心實在抑不住了，我想講了，可是想到講出來的後果怎樣呢？於是我又不講了。我也想現在不講將來有了地位再講，這樣時過境遷，而且我又處於另一地位了，又想還是永遠不講吧！只要自己曉得就好了，將來自己改正。可是一天不講出來，我的內心就苦悶重重，就在這時我又開始轉變了，我首先內心不斷的在想：「我到底以後革命還是不革命」，當我自己肯定革命後，我強烈的要求進步了，特別想到我還年青，我有前途，我更了解在革命隊伍中一天不坦白，痛苦一天不會解決的。苦悶不解除，要進步是不可能的，我深深的追悔過去的錯誤，與感覺組織的苦心教養下，思想又開始轉變了，我決不能自己再姑息自己，因此在反自由主義中，我向組織坦白出我過去嚴重的錯誤，完成了整風中思想革命的第一步。

上海圖書館藏書



AS41 212 0021 24838

上海私市
合衆圖書館



121

